朝話

目次

朝會的來歷及其意義

講到朝會的來歷，就要談到我的生活。大體上說，我自二十歲至二十九歲爲一段落，此段落爲出世思想走佛家的路。二十九歲以後重轉回入世的路，一直到現在。二十九歲那年，在濟南教育廳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先時已在北大講過），民國十年付印，其中有一段意思曾說到求友；在結論中又曾說到我的主張和希望——要復興古人講學之風，使講學與社會運動打成一片。近十數年來我就是如此做，從那時起（民國十一年）也就有了許多朋友跟我在一塊。於是我的生活幾乎是成了兩面的了：一面是家庭，一面是朋友；一面是家庭之一員，一面是朋友團體之一員。朋友們在一起相處，雖然是一種團體生活，但沒有什麼會章，大家只是以人生向上來共相策勵，每

日只是讀書講一講學問。民國十三年，我辭去北大教職，和一些朋友到曹州去辦高中，後來辭職到北平，高中學生也有一些隨着我們到北平去讀書的。

在北平師生共約十人，我們在什剎海租了一所小房子，共同居住，朝會自那時就很認眞去做，大家共勉互進，講求策勵，在冬天尤爲認眞。天將明未明時，大家起來後在月台上團坐，疎星殘月，悠懸空際，山河大地，皆在靜默，惟間聞更鷄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興起特別的感覺，心地淸明，興奮，靜寂，覺得世人都在睡夢中，我獨淸醒，若益感到自身責任之重大。在我們團坐時，都靜默着一點聲息皆無。靜默眞是如何有意思啊！這樣靜默有時很長，最後亦不一定要講話，卽講話也講得很少。無論說話與否，都覺得很有意義。我們就是在這時候反省自己，祇要能興奮反省，就是我們生命中最可寶貴的一剎那。

後來我到廣東接辦省立一中，朋友闡禮也隨着到了廣東，當時我同黃艮庸先生等擬了許多辦法，都是與其他學校不同的，其中最要緊者有五點，現在在鄒平還保存有二點，即朝會與部班主任制。後來創辦河南村治學院時的學則是我擬的，內容大多是從那邊——廣東一中轉來的，鄒平則又是從河南轉來的。

在第一屆研究部時，朝會每由我來講話，初時都作靜默，要大家心不旁騖，講話則聲音低微而沉着，話亦簡單，到後來則有些變了，聲音較大，話亦較長，但無論如何，朝會必須要早，要鄭重，才能有朝氣，意念沉着，能達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強

懺悔——自新

在人生的時間線上須臾不可放鬆的，就是如何對付自己如果對於自己沒有辦法，對於一切事情也就沒有辦法我們都是活人，不做鄉村工作也得生活；但是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順順當當，就不容易。假如此人是資質很平庸的，他自己內心的矛盾衝突或許少；這個意思就是說他還好辦。若是資質很聰穎的人，他自己有點才氣，其問題就越複雜，越難辦！雖然他才氣有，聰明有，但怕他私欲也比旁人勝，比旁人多、大概有聰明的人，好出風頭，愛面子，對聲色貨利等等，格外比旁人貪，格外比旁人求；這是他斬不斷的病。本來他要強的心也比旁人明白，可是他爲壞的心也比旁人高；如果內心不澄清，認不清楚自己，這時他心裡一定有很多的問題。教他去作鄉村工作，也一

定有很多的問題；因為他不能對付自己，則終日惝恍，精神上得不到安慰；自己先不安，還有何法去做鄉村工作呢！

我自己過去的經過，大家於我『自述』一文中，可以見到一個大概；不過還有很多的事情沒有說。我在二十歲的時候，曾有兩度的自殺，那都可以表現出我內心的矛盾衝突來。就是自己要強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討厭自己；此原故是一面要強，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所以『悔恨』的意思就重，使自己給自己打架；自己打架，打到糊塗得眞是受不了的時候，他就要自殺。

如何才能夠使內心的矛盾衝突平下呢？在這個地方，本來宗教很有力量，他能夠幫助着人『懺悔』，幫助着人『自新』。也祇有『懺悔』『自新』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在我說，並不是得到宗教的幫助，所以也不能以

宗教幫助人；不過『懺悔』『自新』，是大家要刻刻在念的。如果誰能夠對於自己的責備越嚴，其『懺悔』也越深，這種人大概都是好人，不過在他心裡有極煩悶複雜的問題而不得解決，所以容易出於自殺之途；這時候最要緊的是幫助着他『懺悔』『自新』。

我所說的『懺悔』『自新』，不是從宗教來，可以說完全是從對人類生命有了解，對人類生命有同情這個地方來的，所以也每每從這個地方去領導人『懺悔』『自新』。所謂對人類生命有了解是甚麼？就是了解人類生命當眞是可悲憫的，因爲人類生命是沿着動物的生命下來的；沿着動物的生命而來，則很近於一個動的機器，機器不用人搖而自動的一個機器是很可悲憫的，他完全不由自主。我之所謂可悲憫，就是不由他自主。很容易看見的是我們活動久了就要疲勞睡覺，不吃飯就餓，很顯著的像機器一樣。其他好

惡愛憎種種情欲，多半是不由自己。看這個貪，看那個愛，忿怨懶惰，甘自墮落，不知不覺的他就那樣。照我所了解的，人能夠管得住他自己的很少，假如好生氣，管住不生氣好難！在男女的關係上，見面不動心好難！他不知怎的念頭就起了。再如好名、出風頭等，有時自己也知道，好歹都明白，可是他管不了自己，

因爲我對人類生命有了解，覺得實在可悲憫，可同情，所以對人的過錯，口裏雖然責備，而心裏責備的意思很少。他所犯的毛病，我也容易有平心說，我祇是個倖而免。例如在男女的關係上，發生甚麼不規則的行爲、不對的事情，我回頭看我自己，祇是倖而免；因爲這樣的念頭我都動過，不過沒有成了事實，僅是倖免而已。這樣對人類有了解，有同情，所以要幫助人『懺悔』『自新』；除此更有何法！人原來如此啊！你自己原諒你自己罷！大家也都各自原

諒自己罷！『過去的不說了，我們再努力開拓新生命罷！』祇有這麼一句話。

在中國古人袁了凡有兩句話說得很好：『以往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這個話實在說得好！如果內心有矛盾衝突的人，我們可以告訴他：『你懺悔自新罷！』『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啊！』可是當眞去『懺悔自新』，又必須看透自己過去所犯的毛病是機械、可憐、糟糕！這時他才能眞對自己生一個悲憫心，把『悔恨』轉爲悲憫，自己可憐自己到了悲憫的心境，自己就高超了一層；自己不打架，不矛盾衝突，這時就無物擋住自己，於是眞能夠『懺悔』『自新』，開拓新生命了。

在新生命開闢出來的時候，他與從前不同的是在甚麼地方呢？卽是從前這個也貪，那個也愛，小的舒服、小的便宜、以及物質享受，這樣的私欲私意多，心動的地方太多，沒有走上一條大道；因此心才這兒跑，那兒跑，鬼鬼祟祟

的亂竄亂穿在『自新』的時候，就是回頭一看，看清了許多都是機械、可憐、糟糕，要不得！把好惡的心，眞的好惡的心透露出來，覺察出從前的雜雜碎碎，眞是臭的所謂『如惡惡臭』，由惡才能知其臭，才能看不上，才能夠舍棄。如果眞的對於這個東西惡，知道往好處去用力，生機就能夠透露出來，彷彿鼻子聞出臭香來一樣，聞出臭香來，就是鼻子的聰明，這樣知道臭香，他才能『自新』。孟子很發揮指點這惡絕的意思，『毋爲其所不爲，毋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這話說的實在到家，人原來分得出來是非——因人都有不像東西的心思，不要作的就不作，這就是『義』；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思，在此擴充，就是『仁』。都是指點在親切的地方去『自覺』好惡，讓他明顯，讓他有力量。

各個同學趕快反省罷！自己從前所犯的種種毛病趕快檢點一下罷！不

要說我沒有較重大被人知道的事情；就是自己誇張，好出風頭的心，都是要不得。這種心不死不行！此心不死，不能作鄉村工作，即使旁的毛病沒有可是懶散不振也不行！這種懶散不振，就是機械性、不由自主的下賤性，是從內心的矛盾衝突來。自己雖然也有要強心，但是自己和自己一打起架來，就憧憧無憑，把不住舵，很容易懶散；懶散是不行的！我們作鄉村工作，必須把大毛病小毛病都要杜塞，發揮真正的生命力量，很順的發揮生命的力量，對自己有辦法，自己先不成問題，這樣下去做鄉村工作才有辦法。

然而如何杜絕毛病的流露呢？祇有『懺悔』，祇有『自新』，在『懺悔』中是一面深深的痛責，一面也要同情人類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不要怪他。能在這裏用力，氣才壯，志才堅；所有過去的毛病，不拖他，不滯他，務期嶄然一新，如用過的紙張一樣，毅然把他燒掉，另立日記本，重新開頭；非如此不可。

我所說的話大概是這樣須大家在淸靜無人時，自己反省，覺察過去；把從前不對的地方，深自「懺悔」掉淚，拋開過去不「懺悔」不拋開，不打主意，是不行的！越是自己要强的，越應要求解決這個問題，自己的問題，自己知道的最親切；也就是說自己的問題，必須自己知道去解決，才能夠下去作鄉村工作

吾人的自覺力

一個人缺乏了『自覺』的時候，便只像一件東西而不像人，或說只像一個動物而不像人。『自覺』眞眞是人類最可寶貴的東西！只有在我的心裏清楚明白的時候，才是我超越對象、涵蓋對象的時候；只有在超越涵蓋對象的時候，一個人才能夠對自己有辦法，人類優越的力量是完全從此處來的，所以怎麼樣讓我們心裏常常清明，眞是一件頂要緊的事情。

古代的賢哲，他對於人類當眞有一種悲憫的意思，他不是悲憫旁的，而是悲憫人類本身常常有一個很大的機械性；所謂機械性，是指很愚蠢而不能清明自主，像完全缺乏了自覺的在那裏轉動而言。人類最大的可憐就在此。這點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得明白，只有常常冷眼去看的時候，才能見到人

類的可悲憫。

人在什麼時候才可以超脫這個不自主的機械性呢？那就要在他能夠清明自覺的時候。不過，這是很不容易。人在嬰兒時代是很蠢的，這時他無法自覺；到了幼年、青年時代，又受血氣的支配很大。成年以後的人，似乎受血氣的支配較小，但他似乎有更不如青年人處，因這時他在後天的習染已成，如計較、機變、巧詐等都已上了熟路，這個更足以妨礙、蒙蔽他的清明自覺。所以想使人人能夠清明自覺，實在是一大難事。人類之可貴在其清明自覺，人類之可憐在其不能清明自覺，但自今以前的人類社會，能夠清明自覺者，實在太少了。

中國古人與近代西洋人在學術上都有很大的創造與成就。但他們卻像是向不同的方向致力的。近代西洋人係向外致力，其對象為物；求對自然

之了解而駕馭之中國古人不然，他是在求了解自己，駕馭自己——要使自己對自己有一種辦法亦即是求自己生命中之機械性能夠減少，培養自己內裏常常清明自覺的力量中國人之所謂學養，實在就是指的這個

人若只在本能支配之下過生活，只在習慣裏面來動彈，那就太可憐了：我們要開發我們的清明，讓我們正源的力量培養出來；我們要建立我們的人格失掉清明就是失掉了人格！

言志

今日早晨想起論語上「盍各言爾志」一句話，現在就言我之志。

「你的志願何在？」如果有人這樣問我，那我可以回答：

我願終身爲民族社會盡力；並願使自己成爲社會所永久信賴的一個人。

在這混亂的中國社會，無論在思想上、在事實上，都正是彷徨無主的時候。這時候做人最難有把握，有腳跟。常見有許多人，在開頭的時候都很有信望，但到後來每每失去了社會的信任，促使社會益發入於混亂。我覺得現在的中國，必須有人一面在言論上爲大家指出一個方向，更且在心地上、行爲上大家都有所信賴於他然後散漫紛亂的社會才彷彿有所依歸，有所宗信。

一個復興民族的力量，要在這個條件下才得形成我之所以自勉者唯此；因我深切感到社會多年來所需要者唯此

八十年來中國這老社會為新環境所刺激壓迫，而落於不幸的命運，民族自救運動一起再起，都一次一次的先後失敗了。每一次都曾引動大家的熱心渴望，都曾漲到一時的高潮；但而今這高潮都沒落了，更看不見一個有力量的潮流可以繫屬多數的人心，而却是到處充滿了灰心、喪氣、失望、絕望。除了少數人盲目地幹而外，多數人無非消極鬼混，挨磨日子。而其實呢，中國問題並不是這樣一個可悲觀的事。悲觀只為蔽於眼前。若從前後左右通盤觀測，定能於中國前途有很深的自信；只可惜多數人蔽於眼前，沒有這眼光罷了！我是對中國前途充滿了希望，絕對樂觀的一個人。我胸中所有的是勇氣，是自信，是興趣，是熱情。這種自信，並不是盲目的、隨便而有的；這裏面有我

的眼光，有我的分析與判斷（我講的『鄉村建設理論』便是這個，不復贅）我是看到了前途應有的轉變與結局，我相信旁人亦能慢慢地看到；因爲從事實上一天一天在暗示我們所應走的而唯一可能的方針路線（鄉村建設）。我的自信不難成爲大家的共信；我的勇氣可以轉移大家的灰頹之氣。大概中國社會不轉到大家有自信、有勇氣之時，則中國將永遠沒有希望。然而民族自救的最後覺悟、最後潮流畢竟是到了！我們就是要發動這潮流，釀成這潮流！這方向指針我是能以供獻給社會的；——我充分有這自信。單有方向指針還不夠，還須有爲社會大衆所信託的人格，爲大家希望之所寄。因此，我要自勉作一個有信用的人，不令大家失望。

發心與立志

許多人都覺得近來生活不安，我亦時常有此感覺因此我知道一般人思想之雜亂，心裏之不純淨，真是很難辦的事！人多半都有種種私慾私意，要這個，要那個；本來我們的志願已經十分渺小，這麼一來就更危險，怕更沒有力量來幹我們的事業了！古人有言：『知病卽藥』！現在讓我指點出來，使大家知道自己心雜無力卽『病』然後才可望常自覺醒警惕！

我聽說有幾位同學讀佛書我對於佛學前曾稍作探究佛家的澈始澈終便是『發心，』『發心』——『發菩提心』發心是什麼？這味道非常深醇，頗難言說。蓋所謂發心不但是悲，且是智慧的；他是超過一切，是對衆生機械的生命，能有深厚的了解原諒與悲憫而要求一個不機械的生命儒家也是要求一個

不機械的生命，但與佛家不同儒家亦有其徹始徹終的一點，在立志然儒家的立志與佛家的發心其精神意味則不同；佛家是原諒與悲憫，而儒家則是剛正的態度這二者內裏自有彼此相通的地方所以終極都是一個自由的活潑潑的有大力量的生命。

我們都是力量不夠的人，要去可憐旁人，先須可憐自己，如何可憐自己？就是須培養開發自己的『願力』（發心與立志都是願力）怎樣開發？要在當初動念幹這個鄉村運動的地方去找，去反問自己爲何有此意思？而此意思爲何久在彼時眞切？這樣能將原來的眞情眞願因反求而開大。當痛癢惻隱之情發露時而更深厚之，擴充之，則正念有力，雜念自可減少惟有願力纔有大勇氣，纔有眞精神，纔有眞事業所以不論佛家儒家，但認取其可以開發培養增長我們力量的一點上，我們只有努力自勉纔能完成我們偉大的使命！

慾望與志氣

在這個時代的青年，能夠把自己安排對了的很少。在這時代，有一個大的欺騙他，或躭誤他，容易讓他誤會，或讓他不留心的一件事，就是把慾望當志氣。這樣地用功，自然不得其方。也許他很賣力氣，因為背後存個貪的心，不能不如此，可是他這樣賣力氣，卻很不自然，很苦，且難以長進。雖有時也會起一個大的反動，覺得我這樣是幹什麼？甚或會完全不幹，也許勉強幹，但當自己勉強自己時，讀書做事均難入，無法全副精神放在事情上，甚且會自己搪塞。自己越聰明的人，越容易有慾望，越不知應在那個地方擱下那個心。心實在應該擱在當下的，可是聰明人老是擱不在當下，老往遠處跑，煩燥而不寧。所以沒有志氣的固不用說，就是自以為有志氣的，往往不是志氣而是慾望。

彷彿他期望自己能有成就，要成功怎麼個樣子。這樣不很好嗎？無奈在這裏常藏着不合適的地方，自己不知道。自己越不寬鬆，越不能耐，病就越大。所以前人講學，志氣慾望之辨很嚴，必須不是從自己那裏動念，才能有眞願力——就是爲人類而發願的，有眞志氣。張橫渠先生頗反對慾望，謂民胞物與之心，時刻不能離的自西洋風氣進來，反對慾望的話沒人講，彷彿較寬鬆，而不似從前的嚴格；殊不知正在這些地方，是自己騙自己害自己。

心理的調整

大家來到此地，都抱有求學研究之志，但我懇切的告訴大家說：單是求知識，沒有用處，除非趕緊注意自己的缺欠，調理自己才好。要回頭看自己，從自己的心思心情上求其健全，這才算是眞學問，在這裏能有一點，才算是眞進步。

人類所以超過其他生物，因人類有一種優越力量，能變化外界，創造東西。要有此變化外界的能力，必須本身不是機械的。如果我們本身是機械的，我們即無改變環境之力。人類優長之處，即在其生命比其他物類少機械性。這從何處見出呢？就是在他能自覺，這是人類第一，也是唯一的長處；而更進步的，是在回頭看自己時，能調理自己。我們對外面的東西，都知道調理他，譬

如我們種植花草，或養一個小貓小狗，更如教養小孩，如果我們愛惜他，就必須調理他。又如自己的臥室，須使其淸潔整齊，這也是一種調理。我們對外界尙需要調理，則對自己而忘記調理，是不應該的。

不過調理自己與調理東西不甚一樣。調理自己要注意心思與心情兩面。心思方面最要緊的是要條理淸楚。凡說一句話，或寫一段文字，或作一篇文章，總要使其淸楚明白，一篇東西，得要讓它有總有分，對一個問題也要能仔細分辨，如缺乏之條理，則增多知識是無用的，因爲知識是要用條理來駕馭的。至心思之淸楚有條理，是與心情有關係的；在心情不平時，心思不會淸楚，所以調理心情是最根本的。

對心情應注意的有兩點：一是懈，一是亂。懈或散懈，是一種頂不好的毛病。偶然懈一下，這事便作不好，常常散懈，則一毫用處沒有，社會上也不會有

人去理他。在寫日記時的苟且潦草敷衍對付，都是從懈來。日記寫的短不要緊，最不好是存苟偸心理。一有這心理，便字不成字，話不成話，文不成文。苟且隨便從散懈心理來，幹什麼事都不成不像，這就完了。

亂或暴亂，是心情不平，常是像有點激動，內部失掉均衡和平；容易自己與自己衝突，容易與旁人衝突，使自己與環境總得不到一個合適。暴亂或偏激，與散懈相反；散懈無力，暴亂初看似乎是有力，其實一樣的不行，都是一種機械性，都無能力對付外面變化，改造環境。這種無能的陷於機械性的人是可憐的，然則如何可不陷於機械而變成一個有能力的人？這是要在能自覺，不散懈，亦不暴亂，要調理自己，使心情平和有力，這就是改變氣質的根本功夫。

調理自己需要精神，如果精力不夠時，可以休息。在我們尋常言動時，絕

不可有苟且隨便的心情；而在做事的時候，尤須集中精力。除非不說不做，一說一做，就必須集中精力心氣平穩的去說去做。譬如寫一篇文章，初上來心很亂，或初上來心氣尚好，這時最好平心靜氣去想，不要苟且從事，如果一隨便，就很難得成爲一氣，所以我們的東西不拿出則已，拿出來就要使他有力量。諸同學中有的卻肯用心思，但在寫文章時，條理上還是不夠，有隨便苟且之意，字句讓人不易看清楚。有的同學還更差些，這不是一件小事體，這是一個很要緊的根本所在，

所以大家要常常回頭看，發見自己的缺欠，注意去調理。做事則要集中精力去做，一面須從容安詳，一面還要挺然挺然是有精神，站立得起。安詳則隨時可以吸收新的材料，因爲在安詳悠閒時，心境才會寬舒；心境寬舒，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運用融會貫通。否則讀書愈多愈無用。

調整自己必親師取友

做人必須要時時調理自己，求心志清明，思想有條理。如果大家能照此去行，簡直是一生受用不盡；如果不能夠注意這話，就是自暴自棄，就是自己不要自己。

但在這調理自己的上面，有什麼好方法呢？前次曾說過調理自己要自覺，要反省，時刻去發見自己的毛病；比如自己的毛病在於性子太急，或在於太亂太散懈，這都須自覺地去求醫治。但是人每不易做到，不易自知其病，雖知病又不易去管理自家。古人云：『智者不能自見其面，勇者不能自舉其身。』這就是說人不易看清楚自己的面孔；即看清了又不易隨時可以自主的調理自己。於是這時唯一的方法，就是『親師取友』此外別無他法。為什麼呢？

因爲每人常會把自己忽忘了，如果不忽忘，就一切都無問題；無奈都易於忽忘，因此就得師友常常提醒你，使你不忽忘

靠朋友之提醒以免於忽忘，這是一層；更進一層，就是靠朋友的好處，以融化感應自己的缺短而得其養，假定我的脾氣是急燥的，與脾氣和平者相處，可以改去急燥；我的精神不振，而朋友的好處是振作的，我處於其中，也自然會於無形中潛移默化，受其影響而得其養

所以如果我們有意去調理自己，則親師取友，是一個最好的辦法。說得再廣泛一些，如果要想調理自己，就得找一個好的環境，所謂好的環境，就是說朋友團體，求友要求有眞的志趣的朋友；好的朋友多，自然向上走了，如果在一塊的人是不好的，那就很危險，不知不覺地就會自趨於下流

再則，朋友彼此幫忙時，所應注意的，就是我既做了你的朋友，就要幫助

你；我自己就先要知道如何去取朋友，如何去做人之師我對朋友如果是愛護他的，自然要留意他的毛病短處，而頂要緊的，還是要對於他的毛病短處，須有一種原諒的意思，我們指點他的毛病短處的時候，應當是出於一個好的感情，應當是一個領導他幫助他的意思。是要給他以調理，不是只給他一個刺激就算完了。自然，有時候一個嚴重的刺激，也是不可少。卽是說有時候有給他一個痛責的必要；但大體上說，你不要只給他一個刺激算完，必須得給他一種調治。如果要惜他的意思不夠，話就不會發生效力。

如何才能得到痛快的合理的生活

今天有三個意思要和大家說。

第一個意思是師生之間切不要使之落於應付，應常常以坦白的心相示，而求其相通。如果落於應付，則此種生活殊無意趣。大概在先生一面，心裏要能夠平平靜靜的，不存一個要責望同學以非如何不可的意思；也不因少數同學懶惰而有不平之氣。在同學一面，更要坦白實在，——不搪塞，不欺騙，不懶惰。所謂坦白，就是指自己力量盡到而言；雖然自己有短處，有爲難處，也要照樣子擺出來。如果力量沒盡到而搪塞飾掩，這是虛僞；如果力量沒盡到而把懶惰擺出來給人看，這便是無恥。這兩者是毀滅生命的鑿子。人生只有盡力，盡力才有坦白之可言。坦白決不是沒有羞惡，沒有判斷，它是要使每個

人從坦白真實裏面來認識自己，來發揮各自的生命力每人都能如此，其情必順，其心必通，才不致落於形式的表面的應付上，才能夠大家齊心向前發展，創造！

第一個意思是：人都是要求過一個痛快的生活但此痛快生活，果何自而來？就是在各自的精力能夠常常集中，發揮，運用此意即說，敷衍、懶惰、不做事，空自一天天企待着去挨磨日子，便沒法得到一個痛快的生活，——也很不合算於此我可以述說我的兩個經驗。

頭一個經驗，彷彿自己越是在給別人有所犧牲的時候，心裏特別覺得痛快、酣暢、開展反過來自己力氣不爲人家用，似乎應該舒服，其實並不如此，反是心裏感覺特別緊縮，痛苦。所以爲社會犧牲，是合乎人類生命的自然要求，這個地方可以讓我們生活更能有力！

再一個經驗，就是勞働。我們都是身體很少勞働的人，可是我常是這樣：頗費力氣的事情開頭懶於去作，等到勞働以後，遍身出汗，心裏反倒覺得異常痛快。

以上這兩個經驗，一個比較深細，一個比較粗淺。但都是告訴我們力量要用出來才能痛快。人類生命的自然要求就是如此。於此苟無所悟，實在等於斲喪自己的生命。

第三個意思是：有的人每每看輕自己的工作，覺得粗淺而不足為，這是一個錯誤。須知雖然是粗淺的事情，如果能集中整個精力來作，也都能做到精微高深的境界。古人云：『洒掃、應對、進退，即是形而上學。』又云：『下學而上達，』都是指此而言。在事情本身說，表面上只有大小之殊，沒有精粗——這件事比那件事粗淺——的分野。俗話說：『天下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

只在各人自求而已。大概任何一件事業或一種學術，只怕不肯用心，肯用心一定可以得到許多的啓示與教訓，一定可以有所得，有所悟。在這個地方的所得，同在那個地方所得的是一樣高深；在這裏有所通，在別處也沒有什麼不通，所謂一通百通。所以凡對人情事理有所悟者，就是很大的學問。此其要點，卽在集中精力，多用心思，去掉懶惰。能如此，才算握住生命眞諦，才算得到痛快的合理的生活。

日常生活的態度

我們日常的生活，(或者說是心理狀態)大概總有一些不合適的地方。其形著於外者，約有三種方式：

(一)譬如大家有時很興奮，對於自己的功課，也很注意，彷彿急於有所求的樣子。這時應當反省這時幹什麼？仔細一想，心裏還是有私有貪。須知世界上沒有什麼可貪的東西，要把他放得空洞闊豁一些就好了。

(二)再就是懈惰散漫，苟且偷安。這時應當把自己心裏頭所有眞切的問題都提出來。問題是心裏的痛癢處，最大的問題，是足以警惕自己的懈惰與散漫的。例如關心國家社會問題，就應當以國難和種種社會罪惡來提醒自己。家庭經濟困難的，就以家貧來提醒自己也未嘗不可(但有流弊)問

題無大小無遠近，只要是眞切地感覺到的就行。這些消極的辦法還不夠，自己還應當抓住自己的長處來盡量發揮。

（三）還有感覺到煩悶的，這個需要找朋友談一談；如仍不能解決時，再求之於師。

除去此三種不合適的心理狀態以後，平平實實的去讀書、工作，那眞是頂理想的生活態度了。我們不要心理上老是存一個東西，最好是坦蕩平實

談習氣

我常說：「一切罪惡過錯皆由懈惰中來」實是如此。精神不振，眞是最不了的事。最讓人精神不振者，就是習氣。凡自己心裏不通暢，都是自找，而非由於外鑠。心小氣狹都是習氣，也就是在裡邊有私意。人人都有要好的心；但終難有好的趨向者，就是因爲習氣的不易改。要想祛除習氣，必須各人的生命力，能超拔於習氣之上才行。

各人的習氣不同，應時常反省，去求了解自己的習氣。大概人類任何學問，都可以幫助人——讓人的生命力強大。苟能常於自身深加體驗，更能於多方面留心，求其了解；則個人身心自然通暢，力量自然強大，習氣自然祛除。自己老是纏住自己，擋住自己，這就是懈惰，最容易弱損自己的生命力

求學與不老

我常說一個人一生都有他的英雄時代，此卽吾人的青年期因青年比較有勇氣，喜奔赴理想，天眞未失，衝動頗強，然是可愛也然此不過以血氣方盛，故暫得如此。及其血氣漸衰，世故日深，慣於作僞，習於奸巧，則無復足取而大可哀已！往往青年時不大見銳氣的，到後來亦不大變；愈是青年見英銳豪俠氣的，到老來愈變化得利害，前後可判若兩人。我眼中所見的許多革命家都是如此。

然則，吾人如何方能常保其可愛者而不致於可哀耶？此爲可能否耶？依我說，是可能的。我們知道，每一生物，幾乎是一副能自動轉的機器但按人類生命之本質言，他是能超過於此一步的「機械性；」因人有自覺，有反省，能

了解自己，其他生物則不能。血氣之勇的所以不可靠，正因其是機械的；這裏的所謂機械，卽指血氣而言。說人能超機械，卽謂其能超血氣，所以人的神明意志不隨血氣之衰而衰，原有可能的：——那就在增進自覺，增進對自己的了解上求之。

中國古人的學問，正是一種求能了解自己且對自己有辦法的學問；與西洋學問在求了解外界而對外界有辦法者，其方向正好不同。程明道先生常說『不學便老而衰』，他這裏之所謂學，很明白的是讓人生命力高強活潑，讓人在生活上能隨時去眞正了解自己；如此，人自己就有意志，亦就有辦法。如果想免掉『初意不錯，越作越錯；靑年時還不錯，越老越衰越錯』，就得留意於此。就得求學。近幾十年來的靑年，的確是有許多好的；祗因不知在這種學問上體會、用工夫，以致卒不能保持其可愛的精神，而不免落於可哀也惜哉！

秋意

現在秋意漸深。四時皆能激發人；春使人活潑高興；夏使人盛大；秋冬各有意思。我覺得秋天的意思最深，讓人起許多感想，在心裏動，而意味甚含蓄。不似其餘節氣或過於發露，或過於嚴刻。我覺得在秋天很易使人反省，使人動人生感慨。人在世上生活，如無人生的反省，則其一生就活得太粗淺，太無味了。無反省則無領略。秋天恰是一年發舒的氣往回收，最能啓人反省人生，而富感動的時候。但念頭要轉，感情要平，心平下來，就對了。越落得對，其意味越深長；意味越深長越是對。我在秋天夜裏醒時，心裏感慨最多。每當微風吹動，身感薄涼的時候，感想之多，有如泉湧。可是最後歸結，還是在人生的勉勵上，彷彿是感觸一番，還是收拾收拾往前走。我夙短於文學，但很知道文學

就是對人生要有最大的領略與認識；他是與哲學相輔而行的。人人都應當受一點文學教育。這卽是說人人都應當領略領略人生。心粗的人也當讓他反省反省人生，也當讓他有許多感想起來當他在種種不同形式中生活時，如四時、家庭、作客、作學生、當軍人、一聚一散等等，都應使他反省其生活領略其生活這種感想的啓發都是幫助人生向上的

朋友與信

朋友相信到什麼程度，關係的深淺便到什麼程度，不做朋友則已，做了朋友，就得彼此負責交情到什麼程度，就負責到什麼程度，朋友不終，是很大的憾事；如同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夫婦之間處不好是一樣的缺憾交朋友時，要從彼此心性認識，做到深刻透達的地方才成相信的程度不到，不要關係過密切了。

朋友之道，在中國從來是一聽到朋友便說「信」字但普通之所謂信，多半是「言而有信」的意思，就是要有信用這樣講法固不錯；但照我的經驗，我覺得與朋友往還，另有很重要的一點；這一點也是信但其講法卻不同，不是信用的意思；而是說朋友與朋友間要信得及，信得過所謂知己的朋友

就是信得及的朋友。我了解他的爲人、了解他的智慧與情感，了解他的心性與脾氣，清楚了這人之後，心裏便有把握，知道他到家。朋友之間，要緊的是相知；相知者彼此都有了解之謂也。片面的關係不是朋友，必須是兩面的關係，才能發生好的感情。因爲沒有好的感情便不能相知。彼此有感情，有了解，才是朋友。既成朋友，則無論在空間上隔幾多遠，在時間上隔多麼久，可是我準知道他不致背離；此方可謂之爲信。

朋友與社會信用

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或在社會上所取得的信用資望，與朋友很有關係，差不多眞是可以以朋友作標準，而決定在社會上之地位信用；彷彿一個人他自己不能有一個顯著的顏色——自己固然有顏色給人看，可是朋友幫助他的顏色更顯著。交什麼朋友，就歸到那一類去，爲社會看爲某一類的人。沒有較高尙的朋友，在社會上自己不會被人看高一點；能不能有較高尙的朋友，那完全看自己的情感志氣趣味如何。朋友相交，大概在趣味上相合纔能成功眞朋友。從自己的趣味、好尙、品格，而定朋友高低；從朋友高低，而定自己在社會上的信用地位。那麼，人不能交高尙的朋友，在社會上很難得到較好的地位，而自己趣味好尙不高時，也很難交得較好的朋友。

說到我的交友，可分為兩個段落：頭一個段落為我二三十歲時所交的朋友，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比我年紀大的，如張難先、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諸先生都比我大十歲或二十歲，他們對我可算是忘年交，我看他們都是在師友之間的。不同年齡的人共趣味不同，而竟能成功很好的朋友，這都不是容易的。後一個段落裏頭的朋友，多半都比我小幾歲，他們以我為中心而形成一個朋友團體，一直到現在還一起共學共事。

現在中國社會與以前老社會不同。由個人相交而成朋友的，這是老的方式，以後朋友的關係要生變化，不單是個人彼此的關係，說朋友就是集團，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團，或自己創造集團。

談學問

一說到學問，普通人總以為知道很多，處處顯得很淵博，纔算學問。其實就是淵博也不算學問。什麼纔是學問？學問就是能將眼前的道理、材料，系統化、深刻化更扼要的說，就是『學問貴能得要』。能『得要』纔算學問。如何纔是得要？就是在自己這一方面能從許多東西中簡而約之成為幾個簡單的要點，甚或只成功幾個名詞，就已夠了。一切的學問家都是如此。在他口若不說時，心中只有一個或幾個簡單的意思；將這一個或幾個意思變化起來，就讓人家看着覺得無窮無盡，所以在有學問的人，沒有覺得學問是複雜的，在他身上也沒有覺得有什麼，很輕鬆，真是虛如無物。如果一個人覺得他身上背了很多學問的樣子，則這個人必非學問家。學問家以能得要，故覺輕鬆、

被適、簡單，和人家講學問亦不往難處講，只是平常的講，而能講之不盡，讓人家看來很多；如果不能得要，將所有的東西記下來，則你必定覺得負擔很重，很爲累贅，不能隨意運用。所以說學問貴能得要；得要就是心得，自得！

再則學問也是我們腦筋對宇宙形形色色許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行，消化不了更不行。在學問裏面你要能自己進得去，而又出得來，這就是有活的生命，而不被書本知識所壓倒。若被書本知識所壓倒，則所消化太少，自得太少。在佛家禪宗的書裏面，敘述一個故事，講一個大師對許多和尚說：「你們雖有一車兵器而不能用，老僧雖只寸鐵，便能殺人。」這寸鐵是他自己的，所以有用；別人雖然眼前擺着許多兵器，但與自己無關，運用不來；這就是在乎一自得，一不自得也問題來了，能認識，能判斷，能抓住問題的中心所在，這就是有用，就是有學問；問題來了，茫然的不能認識問題的訣竅，

不能判斷，不能解決，這就是無學問。

研究問題所需的態度

研究問題必須具有的態度，大概可分三點來說：

(一)要有一個追求不放鬆的態度。不追求則很容易只看見一些廣泛的材料，而不能把握其要點。凡能把握問題所在者必能追求不已。譬如我講話好繞大圈子，實則我沒有法子不繞大圈子。因追求乃能輾轉深入而探到問題的根本。等到講話時就彷彿繞圈子了。

(二)要不怕問題牽聯廣大並且不要注意這個，就忘去了那個，要能將與本問題有關係之各方面都照顧得到。要能輾轉牽引，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可是始終還是一個球。

(三)要從容有含蓄，不要性急。性急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毛病。當你對

他講這樣不好，他就以爲你主張那樣。你說民主制度不好，他就想到你是相信獨裁；你批評資本主義，他就想到你是共產黨。諸如此類，這都是由於性急之故。我說話時常常不願說一面理，譬如講近代西洋政治制度時，先說明其牽掣均衡的巧妙處，但我的意思卻不在這裏；這裏是賓；其與我之主張結論相去不知多少路遠，在這底下要轉灣的；因爲我的思想經過了許多變化，只是要憑此曲折以襯托出我的正面意思而已。若遽以爲我的主張是這麼樣，便是一個大錯誤。可是在心淺性急的人，卻很容易辨不清賓主本末而發生誤會。

我最不想發表單篇短文章，不願在許多問題中抽出一個問題來談，除非在不得已的時候；因爲短文很難將自己整套意思前後曲折發表出來，不能全部拿出來，是我最不甘心的。譬如一幅圖畫，是由陰陽明暗幾面配合成

功的：假如陰陽明暗左右前後沒有完全排比出來，支節片段的東西就不能供人家的欣賞領略。有時爲事實所迫，這不甘心的事却亦作了不少。

現在外面對我有誤會的太多。其故蓋在一般人心淺性急，而我的理論主張又未全盤發表（編者按：全部理論現已出版）再則道理雖同一道理，而在普通人於事實來到，固可一點卽破，不難相喩；事實未到眼前，則千言萬語亦殊難了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中國問題的複雜性與深曲性均達極高程度，大家不了解我倒是件小事；沒有研究問題的態度，而躭誤了民族社會的前途，却甚可懼！有志青年幸其留意！

擇業

關於擇業問題，我覺得最好的態度有兩個：

(一)從自己主觀一面出發來決定看看自己最親切有力的要求在那點；或對於什麼最有興趣如自己對於社會問題、民族危亡問題之感觸甚大，或對自己父母孝養之念甚切，或對家庭朋友的負担不肯推卸……這些地方都算眞切的要求。與趣即是自己所愛好的方面很多，自己興趣之所在，即自己才思聰明之所在。這兩方面都是屬於主觀的條件的。從這裏來決定自己往前學什麼或作什麼：學這樣或學那樣，作大事或作小事。但自己主觀上的要求與興趣雖有，而周圍環境不一定就有機會給你；給你的機會，亦不一定合于你的要求、興趣；這時如果正面主觀力量強的話，遲早可以打通這個

局面

（二）由客觀上的機緣自然地決定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態度把自己的心放得很寬，彷彿無所不可，隨外緣機會以盡自己的心力來表現自己這時自己雖無所擇而自然有擇這個態度一點不執着，也是很大方的

最不好的就是一面在主觀上沒有強有力的要求，興趣不清楚，不真切，而自己還有捨不開的一些意見選擇，於是在周圍環境就有許多合意與不合意的分別這些分別不能解決——一面不能從主觀上去克服他，由不合意的環境達到合意的環境；一面又不能如第二個態度之大方不執着——就容易感覺苦悶苦悶的來源，即在於心裏不單純，意思複雜在這裏我可以把自己說一下，給大家一個參考

就我個人說，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從前個性要求或個人意志甚強最易

看出的是中學畢業之後不肯升學，革命之後又想出家。可見自己的要求、興趣很强，外面是不大顧的。從此處轉入哲學的研究，從哲學又轉入社會問題之研究與社會運動工作，這彷彿是從主觀一面出發的多。但這許多年來在實際上我覺得自己態度很寬大，不甚固執，隨緣的意思在我心裏佔很大位置。就我的興趣來說，現在頂願作的事，就是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將所見到的道理，類乎對社會學的見地與對哲學的見地，能從容地寫出來，那在我眞覺得是人生唯一快事。但是目前還須要應付許多行政事情，我識人任事似非所長，所以有時會覺得苦。可是我不固執，幾乎把我擺在那裏就在那裏，順乎自然的推移，我覺得把自己態度放得寬大好一點。「不固執」「隨緣」一多少有一點儒家「俟天命」的意思。我自己感情多一點，因情有所難却，情有所牽，就順乎自然地隨着走。

我的情形大概如此、同學對個人問題應從主觀客觀各方面來審量一下，或偏治學，或偏治事，治學治何種學，治事作何種事，來得一決定，向前努力

對異己者的態度

對方與我方向不同的人，與我主張不同的人，我們都要原諒他並要承認對方之心理也是好的，不應作刻薄的推測；同時，在自己的知識見解上要存疑，怕也不必都對。我覺得每個人對自己之知識見解，常應覺自己不夠，見聞有限，自覺知識見解低過一般人，旁人都像比我強，這種態度，最能夠補救各種不同方向（派別）的彼此衝突之弊，而互相取益。衝突之所由起，即在彼此都自以為是。如此，則我不容你，你又妨礙我，彼此牽掣牴牾，互相折毀，無非是各人對自己之知識見解自信得太過，對對方人之心理有過於刻薄的看法，而有根本否認對方人的意思，此種態度，為最不能商量的態度。看不起對方人，根本自是，就不能商量，落於彼此相毀，於是大局就不能不受影響了。故

彼此都應在心術上有所承認，在人格上有所承認，只是所見須商量彼此能商量，然後才可取得對方之益，達於多分對的地步。我每嘆息三十年來各黨派、各不同運動的人才，都不可菲薄，但他們都有一個最大的缺點。此缺點就是在沒有如上面所述的那種態度。對對方不能相信相諒；而自己又太自信。所以雖是一個人才，結果，毀了別人，也毀了自己。毀在那裏？就毀在態度上。人生本來始終脫不開與人互相交涉的。越往後，人生關係越複雜，越密切；彼此應當互相提挈合作，纔是對的。可是和人打交涉，相關係，有一個根本點：就是，必須把根本不相信人的態度去掉，把我們說的意思放在前頭，纔是彼此相往來的根據；否則就沒有往來交涉的餘地了。如從不信任的地方對人，就越來越不信任人；轉過來從信任人的方面走，就越來越信任人。不信任人的路，是越走越窄，是死路；只有從信任人的路上去走，纔可開出真正的關係和事。

業的前途來。

我們應有的心胸態度

社會上一般人，有的以共產黨爲洪水猛獸，有的以軍閥爲貪鄙糊塗，其實這都是因爲隔膜的緣故。人與人彼此之間，都相差不多，距離是很近的；如果有距離，只是到末流時纔大，開頭是很小的。社會間的人，需要彼此了解；否則彼此隔閡，將會增加社會的不安，是社會擾亂衝突的主要因素。

再則，此人作軍閥，彼人作共產黨，其責任均不在他自己。過分責備與過分看重這個人，同樣是很錯誤的事。我們應當看重社會關係與其歷史的演變。個人在社會中的分量眞是太小了，社會環境之力眞是太大啊！昔時有人批評曹孟德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爲能臣，爲奸雄，其權不在於他自己，而在於治世亂世的社會環境，在此種社會中則如此，在彼種社會中則

又將如彼，這眞是最確實的話，因此，我們所要做的工夫，要緊的就在轉移社會之大勢，把每一個人放在一個合適的場合中，使他們得以盡量發展其天才，各得其所用，我的用心與認識就是如此。必能轉移社會之大勢，鄉村建設運動纔有其意義。

至如何轉移社會大勢的話，我在『鄉村建設理論』中都曾述及，現在不再細說，但都必須先認清中國社會的形勢才好講。中國社會的形勢與其他社會的形勢是頗相反的。尤其是在想藉着這形勢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時候，更將走入不同的路徑。照一般的例說，每一個國度內，都有幾種樣、幾部分、幾方面不同的勢力，在他們彼此間，一面是互相依存，一面又是互相矛盾，如果互相依存的一面多有發揮的可能時，那麼，這社會就平順地向上進步；如果進步到滿了那可能的限度時，則其矛盾的一面就嚴重化、尖銳化，而免不

了要暴發革命所有其政治構造都是依於此形勢而建立；所有其社會內各樣的政治運動，亦無非本着其爲某種樣、某部分、某方面勢力的背景和立場而向前競爭或鬥爭；在競爭鬥爭中，也有走調和聯合路的，但沒有單純走調和聯合路的；因爲其間常有不可避的矛盾衝突，而無法言調和聯合。中國今日恰是落到一個散而且亂的情形，其社會內部沒有清楚的分野，一切人的背景立場可以說都不同，又都差不多，其間的矛盾都不重大、不堅強；因此幾乎無法形成一種政治構造。但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盡着力量拋開各自特殊的背景、立場，而單純地求調和、聯合，以謀其社會內部的調整統一，以應付國際環境。

我深刻相信，人當初的動機都是好的，沒有誰安心去害人，不單共產黨當初動意原無不善，就是軍閥也未嘗不想要好。我們在這時切不可把人家

看得都不好，把自己看得都太好；應當深切認識人都是差不多的——人情大抵不相遠把自己的心先空洞起來，打破一切成見，去掉一切隔膜，彼此才可以求瞭解，才可以溝通一切而聯合一切，才可以轉移社會關係，才可以挽救這垂危的民族！唯有這條道路可走。現在所要的是要合不要分，要通不要隔。誰能聯合一切，打通一切，誰就是能轉移社會關係而讓民族復活的民族的生命就維繫在這一點上，所以，我們都應當有這樣的心胸態度；並以此相信、相諒、相勉！

開誠布公以立信

現在社會上，實在找不出一個讓多數人信得及的人或團體，他們——人或團體——在談話時，都說得非常之好，非常動聽；但是人卻總不敢相信他，都以爲他的背後還別有用意；這是現在中國社會上的一種普通現象。即以我們的鄉村運動來說，別人在未了解以前，也同樣地以爲我們別有企圖，而非眞來作此工作。中國社會之不安，半由於斯。此種不相信之態度，實非好現象。不相信，一切事都難做通，事情唯有相信才可以做得通。如大公報幾次抗日募捐，數目達到七十萬元之鉅，社會人士踴躍輸將，而不稍有疑心；此其故，即以其信用已生根於社會，人人皆信得及，相信其不致有何差誤，故敢出然相託。中國今日民窮財困，達於極點，六七十萬元在西洋社會原自不成問

題，而在中國則着實不易；由此可以看出社會人士之重義，及要求公道之心理，是如何迫切！但現在情形，到處烏煙瘴氣，黑幕重重，使社會找不出一個信得及的人或團體，以致滿懷熱誠，無由發洩，雖欲援助亦無從援助起。故目前社會要求有信用的人或團體，眞是如飢如渴！古人云：『民無信不立』旨哉言乎！此意思實甚重要。不相信的態度，實爲一大亂源，因不相信，故各懷鬼胎，互爲猜忌；事情原無惡意，但如此一來，便亦『好意當作惡意』了。

人與人之間是如此，社會與社會間亦恰無二致，如此下去，其危機不言可喻。現在的問題，是在如何才能使社會信得及？以我所見，這只有澈底的開誠布公，將一切曖曖昧昧遮遮掩掩的行爲，根本剷除，好事情固可昭然於社會；即不好的事，也必須直言不諱，一切都公開。這樣自然一面可以解除誤會；一面也漸漸地可以使人對你信得及的確，人心都是要求光明磊落的，凡是

光明磊落說出做出的事情，即便不好，人也甘心。人最不樂意於藏頭露尾，半吞半吐的把戲。此道理無論在家庭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一切人與人之間，皆是如此。如能看透此點，本此去公開作事，自然可以行得通。自身先不使人懷疑；人家才肯相信人家相信得及，纔肯拚死相助，終至萬衆一心。

我的信念

第一個信念：我覺得每人最初的動機都是好的，人與人都是可以合得來的，都可以相通的不過同時每一個人亦都有些小的毛病因人人都有毛病（不過有多少輕重之分）故讓人與人之間，常有不合不通的現象。雖不合不通之事常有，但人在根本上說，向上要好，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究竟有其可合可通之處在我們應努力去擴大此可相通相合之點，與天下人作朋友，而不與人隔閡分家這是我第一個信念。我總是相信人，我總覺得天下無不可合作之人，我始終抱定這信念而向前邁進，毫不猶疑！

第二個信念：我覺得一切的不同都是相對的，比較的換言之，即一切的不同都是大同小異自其異者而觀之，則無往而不異；自其同者而觀之，則實

亦無何大不同所以彼此縱有不同，不必看成絕對鴻溝之分。更進一步說，即不同，其實亦不要緊，天下事每每相反而實相成。章行嚴先生因墨子有尙同之說，故標尙異之說，以爲要歡迎異的，要異纔好。我們在見解主張上不必太狹隘、固執；要能「寬以居之，」方能將各方面容納進去。如果對於方向路子拿得很狹隘，往前去作，難得開展。所以我於異同之見不大計較。此原則，我運用亦有時失敗，但那只是安排得不恰當；我現在惟有盼望我更智慧一點，不再蹈以前的錯誤。我始終要本此態度作去。

談合作

普通之所謂合作，大概都是指着在經濟上的事情，這是狹義的合作。這話不必說。現在說廣義的合作。

有一位朋友說：『小合作有小成就，大合作有大成就，不合作就毫無成就』此意甚的。這不獨是說到經濟方面，即是說到了人生的道理，社會的道理，亦無一不是這樣。大概從現在往前去——往將來去，人類的社會關係，將慢慢地越來越複雜，大家都必須在相關係中而生活；你想自顧自與人分離而能獨立生活，實在沒有這回事。在事實上催逼着你非趨向於合作不可。若是各顧自己，則不惟自己不能生活，而社會的整個關係，都將不能維持。所以必須在合作的根本上注意一下。

怎樣才能合作呢？在這裏有一句頂要緊的話是，「氣要穩，心要通」怎樣才能把氣穩得住？就是要注意當下，在眼前問題上事情上下工夫；不能這樣，就是氣不穩。如聽我講演，眼向外看就是氣不能穩再說心通，不獨自己心要通，尤要與人家的心相通；不與人家的心相通，則無由合作氣穩纔能作，「作」字有了；心通——情誼通，這就是「合」字有了

「心通——情誼相通」這句話，說容易很容易，說不容易也很不容易別看兩人在一起做事情表面固然沒有什麼，但如果都是勉强對付，這樣，事情就絕對不能做得好所以情誼相通，爲合作之根本

但情誼又如何相通呢？這話不能從片面着想，必須從兩方面來說一面是自己，一面是人家在自己一面必須常體會對方的心理、意思、情形才行彼此必須互以對方爲重，不容專替自己方面着想如果你老是爲自己打算，爲

自己着想，將人家的心理、意思，都放置而不顧，這個絕對不行，所以你必須先替人家着想。能替人家着想，就沒有不通；通就能做，做更能通，越做越通，大家心情都順了，就一切事沒有不能做的。情誼不通的結果，就是彼此互相頂着鬧彆扭，你幹他不幹，他不幹你也許更不幹，這樣就會越弄越糟。

以上這個道理，不獨居家過日子是如此，師生之間是如此，政府中人是如此，整個社會中人又何莫不然？人生是到處離不開人，到處必須與人相關係在一起生活過日子。既在一起生活，就應該「共謀一種好的生活」所以大家必須記住：「合作的根本，即在情誼相通；情誼相通，必彼此互以對方爲重；惟有情誼才可促進人類的好生活」將這話牢牢的記住，小心隄防此道理雖甚粗淺，然實爲到處有用而終生講求不盡的道理。情誼相通眞是談何容易啊！

啓發社會的力量

我們的事業，就在啓發社會的力量；使死的散漫的社會，變成活的團聚的社會；從社會沒有力量，變成社會有力量，社會有力量須打通地方上有力量的人的心現在最不了的是大家缺乏公共意識；要社會大家有公共意識，須先在一地方上開出大家的公共意識（從小範圍下手）

我們要拿好意待一切人，什麼人都是有心作好人的我們要消除種種險阻；人家和我作對，我不與人作對只要是肯出力替社會負責的人，我們都盡量幫助他

我說社會太死，是指私意太深要想社會不死，誠然很難；非有很大的志願，勇氣，信心，不能把這垂死的人心活起來人的天性是公的，决不是一生下

就是私的老拿這種大公無私的心來點醒他們，不管他們是怎樣詭詐，終不能毫無所得

再有一層，便是作事不要有求急效的心，急若要有成績，反會成績毫無

常常看見他人的長處，而動佩服之心，自己就會常常向長進裏去

眞理與錯誤

對旁人人格總不懷疑，對自己知識見解總覺得不夠，人類彼此才可以打通一切。這態度是根本的。頂要緊的是澈始澈終不懷疑人家心術，澈底的覺得自己的知識見解不夠。澈始澈終追求下去，才能了解各派；了解各派到什麼程度，才可以超各派到什麼程度，最後的眞理獲得是可能的。只怕你不懷疑，不發生問題，不去追求。

眞理同錯誤，似乎極遠，却又極近。任何錯誤都有對，任何不對都含有眞理；他是錯，已經與對有關係，他只是錯過了對如何的錯，總還有一點對；沒有一絲一毫的對，根本沒有這回事。任何錯誤意見都含有對；較大的眞理是錯誤很少，最後的眞理是錯誤的綜合錯就是偏，種種的偏都集合起來，容納起

來，就是眞理容納各種派，也就超越了各種偏，他才有各種偏。最後的眞理就是存在這裏。

我說每種學說都有他的偏，並不是說沒有最後的結局凡學問家都是蒐集各種偏而人類心理都是要求統一，不斷地要求統一，最後必可做到統一。最有學問的人，就是最能了解錯誤來源的人；有最高見解的人，是能包括種種見解的人。人類心理有各種的情，常常表見在各種的偏上，好惡可以大相反。可是聰明一點的人，生命力強，感情豐富的人，他能了解各種偏的來源，而能把種種的偏都包含進去，所以他就能超聖人能把各種心理都容進來，他都有，所以他是最能了解一切的人而通天下之情，所以說眞理是通天下之見，是一切對或一切錯誤的總攝。孟子說「聖人先得我之同然」（孟子所謂同然有所指，姑爲借用）聖人對人都有同然；性情很好的人，聖人與他

有同然；即性情極怪的人，聖人也與他有同然。聖人完全了解他，所以同然。聖人與天下人無所不同然。最有高明見識的人，才是最能得眞理的人；他對於各種意見都同意，各種錯誤都能了解。

先父所給予我的幫助

我從小學起一直到現在，回想一下，似乎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主動的；無論思想學問作事行爲，都像不是承受於人的，都是自己在那裏瞎撞，幾乎想不出一個積極的最大的能給我帮助的人來我想到對我幫助最大的最有好處的，恐怕還是先父

先父給我的幫助是消極的，不是積極的我在「思親記」上曾說到這意思。我很奇怪，在幾十年前，爲父親的對兒子能毫不干涉，除了先父之外，沒有看見旁人的父親對他的兒子能這樣的信任或放任恐怕我對於我自己的兒子，也將做不到。先父對我的不干涉，最顯著的有三點：

（一）我在中學將要畢業的時候，一面攷畢業試驗，一面革起命來本來

在末畢業時，已與革命黨人相通，畢業後便跟着跑革命。到第二年民國成立，照普通說這時應當去升學，不應當去幹沒有名堂的把戲——我們那時的革命，雖也弄什麼手槍炸彈，但等於小孩子的玩藝，很不應如此。而我不想去升學，先父完全不說，也不勉強我。先父的人生思想是向上的，有他的要求主張，可是他能容納我的意思而不干涉，何以能如此，我現在還完全想不到。

（二）後來我由革命的社會主義轉到佛家，自己終天東買一本佛書，西買一本佛書，暗中自去摸索。這也是主動的瞎撞，一直瞎撞若干年——先父也不干涉。先父有他的思想，他自以為是儒家的，可是照我的分析，先父的思想與墨家相近，可說表面是儒家而裡面是墨家的精神，對於佛學很不喜歡。我的思想轉向佛家，我就要出家，不娶妻，先父只將他的意思使我知道，而完全不干涉我，這就成就我太大。那時我雖明白先父的意思，但我始終固

執，世界上恐怕找不出像我這樣固執的人來。

（三）就是不娶妻。這事在他人非干涉不可。我是兩弟兄，我哥結婚十年，沒有兒子，照普通說，老人都很盼望有孫，尤其先父自民國元年至民國七年，開始終存自殺之念——不願苟活之意，自己存心要死，又當晚年沒看見孫，有後無後不知道，在普通看法，一定要責備我，可是先父半句責備的話都沒說。就是我母親在臨終之前，告訴我不要固執己見，應該要娶親；而先父背後告訴我說：雖然母親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還是以自己意思為主。民國七年先父在要殉節的時候，仍無半句話責成我要結婚，他是完全不干涉。這個信任或放任——這放任非不管，另有他的意思，即於放任中有信任——給我的好處幫助太大，完全從這消極的大的幫助，讓我有後來的一切。大概在先父看到這一點：這孩子雖然是糊塗錯誤，但自己頗有自愛要強的意思，見

在雖錯，將來可『對，』這『對』可容他去找現在不要干涉先父的意思，恐怕就是這樣

我的生活實情

我自己行動多悔，差不多幾十年來總是這樣子，所謂心安理得者，在我心中很不容易繼續，即很不容易比較沒有問題，不後悔。這有兩層原因：自己從小時起，要強，不同流俗的意氣盛，這種意氣支配了自己，就容易有悔有悟。反過來說，如一個平常流俗的人也許沒有這樣多的問題。這是一層。還有一層，就是這時代正當到大轉變，入於紛亂，無正軌可循，無路子可走。碰到這時代，很難作到平穩，若眞是能作到常常心安理得，怡然理順，必然是內裡面生命力很強，工夫作到很高的程度。我既是那樣一個人，所遭遇的又是這樣一個時代，故很難沒有問題；而同時心中自己對自己有問題，所以力量不大，因爲許多力量都耗費在自己身上也。故一種奮爽有力的生活不能長，只是一

陣而已。本來在這時代，在這世界，所需要的是對大局有判斷，對自己生活能奮爽有力，而我生活上的奮爽有力卻不能長，心中常常是徘徊游移，可說情緒方面不安，從眼前一件小的事情可以作例，就是我到廣州去不去，在心中都不能爽快的決定，這就是不行，都是心中有毛病，沒有力量在不能爽快的決定時，卽事後容易追悔的一個預兆。這件事情——到廣州去——是一件小的事情，但還有比這更小的事情，譬如在一天中作什麼事，或人家來信如何回答，或有問題如何處分，細細想來，所謂心安理得爽快有力，都作不到，我現在差不多沒有旁的要求，我所求的是能夠常常心安理得，內部很妥貼，自己行動很順，少恨那嗎，這個樣子，我心裡頭可以說是舒服好過，而表現在外面的或許比現在有力量。

大概總是自己有許多毛病習氣不能化除，而同時自己又不肯糊塗嗎。

虎。如眞是糊塗馬虎，也許就混過了。我希望大家各自看自己，這個沒有旁的，只看自己有沒有可悔的，是不是自己都很順，自己對自己有否滿足的地方。馬虎也許是讓自己少苦的，可是馬虎是一大危險，並且是自己不知道馬虎而馬虎，還沒有什麼，若有意的馬虎，心中一定很苦。

怕人類到今天頂不好辦——精神上不好辦，尤其是今日之中國人不好辦，其精神上之苦悶，難得條理順當。可是精神上不能條理順當，則沒有力量，不能創造，不能打開局面。所以在這時想法作對精神的條順工夫是非常必要的。

我自己的長短

我的長處，歸結言之，可有兩點：一點爲好用思想，思想深刻；一點則爲不肯苟同於人，至於短處，不能用一句話說出來，大概說來就是自己不會調理自己，運用自己頭腦好像一條長的繩索，發揮放射出去，就收不回來，如我之好犯失眠症即其顯証，要治此病，我自己也有一個方法，就是『誠』大家或許也看出我是一片眞誠；不過，實在說來，也在某一些地方上的念頭不單純意思多就是不誠，不誠則自己全副生命不能凝集於一處，意思紛歧，念頭就拴不住，仍然是不由自主的在活動。

在表面上似是自己能管理自己，旁人也看我是如此，如吃苦耐勞，屏絕嗜好，食色都很淡泊，其實這都是自己在勉强自己，勉强就等於以一個我管

理一個我，他不是整個生命力的偉大活潑，就是不誠、不真切，這是不對的。我自己很知道生命力要是活潑的整個的才對，可是老是做不到，別人看我像是很好，其實內裏也有毛病。

求到而做不到，這在我的確很苦，所以我求師求友之念極切，常想如何得遇哲人救我一下。孔子，是千載不遇的；就是遇到陽明先生及其弟子來教導我一下也好。我如果遇到，就把全生命交給他，要我如何我便如何。但這樣的人在現在人類社會中彷彿沒有，也或許是我求師求友之念不很真切吧？

大概一切生物都像機器一樣，不停止的不自主的在那裏轉，只有中國和印度的古代賢哲是比較進步了好多，他了解自己是如何去轉，能以自動的轉，不是機械的轉。我自己覺得我現在還是在那裏不自主的轉。在學理上，我是比普通所謂學者的能了解人是自主的、自由的，自己可以運用自己，即

中國印度賢哲的境界我知道了一點；（普通人大都是不自主而自己還不了解，此實糊塗危險）但還是沒有做到那一種地步。這是我的一個缺欠。如果能再進一步，一定可以減少許多狂妄的地方

三種人生態度

——逐求、厭離、鄭重——

『人生態度』是指人日常生活的傾向而言，向深裏講，即入了哲學範圍；向粗淺裏說，也不難明白。依中國分法，將人生態度分為『出世』與『入世』兩種，但我嫌其籠統，不如三分法較為詳盡適中。我們仔細分析：人生態度之深淺、曲折、偏正……各式各種都有；而各時代、各民族、各社會，亦皆有其各種不同之精神；故欲求不籠統，而究難免於籠統。我們現在所用之三分法，亦不過是比較適中的辦法而已。

按三分法，第一種人生態度，可用『逐求』二字以表示之。此意即謂人於現實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飲食、宴安、名譽、聲色、貨利等，一面受趣味引誘，一

面受問題刺激，顛倒迷離於苦樂中，與其他生物亦無所異；此第一種人生態度（逐求）能夠澈底做到家，發揮至最高點者，即爲近代之西洋人。他們純爲向外用力，兩眼直向前看，逐求於物質享受，其征服自然之威力實甚偉大，最值得令人拍掌稱贊。他們並且能將此第一種人生態度理智化，使之成爲一套理論——哲學。其可爲代表者，是美國杜威之實驗主義，他很能細密地尋求出學理的基礎來。

第二種人生態度爲「厭離」的人生態度。第一種人生態度爲人對於物的問題，第三種人生態度爲人對於人的問題，此則爲人對於自己本身的問題。人與其他動物不同，其他動物全走本能道路，而人則走理智道路，其理智作用特別發達，其最特殊之點，即在回轉頭來反看自己，此爲一切生物之所不及於人者。當人轉回頭來冷靜地觀察其生活時，即感覺得人生太苦，一

方自己爲飲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糾纏，不能不有許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面，社會上又充滿了無限的偏私、嫉忌、仇怨、計較，以及生離死別種種現象，更足使人感覺得人生太無意思。如是，乃產生一種厭離人世的人生態度。此態度爲人人所同有，世俗之愚夫愚婦皆有此想，因愚夫愚婦亦能回頭想，回頭想時，便欲厭離。但此種人生態度雖爲人人所同具，而所分別者卽在程度上深淺之差，只看澈底不澈底，到家不到家而已。此種厭離的人生態度，爲許多宗教之所生。最能發揮到家者，厥爲印度人；印度人最奇怪，其整個生活，完全爲宗教生活。他們最澈底，最完全；其中最通透者爲佛家。

第三種人生態度，可以用「鄭重」二字以表示之。鄭重態度，又可分爲兩層來說：其一、爲不反觀自己時——向外用力；其二、爲回頭看自家時——向內用力。上述之逐求與厭離兩者，在此種人生態度中都有，並且由回頭看

所產生之鄭重態度，較向外逐求所產生之人生態度格外到家，格外深入。在未曾回頭看而自然有的鄭重態度即兒童之天真爛縵的生活兒童對其生活，有天然之鄭重，與天然之不忽略，故謂之天真；所謂天真即順從其生命之自然流行也。於此處我特別提出兒童來說者，因我在此所用之『鄭重』一詞似太嚴重，其實並不嚴重，我之所謂『鄭重』，實即謂聽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鄭重』即是將全副精神照顧當下，如兒童之能將其生活放在當下，無前無後，一心一意，絕不知道回頭反看，一味聽從於生命之自然的發揮，幾與向前逐求差不多少，但確有分別，此係自淺一方面而言。

更深而言之，從反回頭來看生活而鄭重生活，這纔是眞正的發揮鄭重，這條路發揮得最到家的，即爲中國之儒家。此種人生態度亦甚簡單，主要意義即是教人『自覺的盡力量去生活』，此話雖平常，但一切儒家之道理盡

包含在內；如儒家之「寡欲」「節欲」「窒欲」等說，都是要人清楚地自覺地盡力於當下的生活。儒家最反對仰賴於外力之催逼，與外邊興趣之引誘往前度生活。引誘向前生活，為被動的、逐求的，而非為自覺自主的；儒家之所以排斥欲望，即以欲望為逐求的，非自覺的，不是盡力量去生活。此話可以包含一切道理：如「正心誠意」，「慎獨」「仁義」，「忠恕」等，都是以自己自覺的力量去生活。再如普通所謂「仁至義盡」，「心情俱到」等，亦皆此意。

此三種人生態度，每種態度皆有淺深、淺的厭棄不能與深的逐求相比逐求是世俗的路，鄭重是道德的路，而厭棄則為宗教的路。將此三者排列而為之較，當以逐求態度為較淺；以鄭重與厭離二種態度相較，則鄭重較難。從逐求態度進步轉變到鄭重態度自然也可能，但我覺得很不容易。普通都是由逐求態度折到厭離態度，從厭離態度再轉入鄭重態度，宋明之理學家大

多如此，所謂出入儒釋，都是經過厭離生活，然後重又歸來盡力於當下之生活。即以我言，亦恰如此。在我十幾歲時，極接近於實利主義，後轉入於佛家，最後方歸轉於儒家。厭離之情殊爲深刻，由是轉過來纔能盡力於生活；否則便會落於逐求，落於假的盡力。故非心裏極乾淨，無纖毫貪求之念，不能盡力生活。而眞的盡力生活，又每在經過厭離之後。

生命的歧途

昨日閱某生日記云：「人生有三件事，革命、文學與醇酒婦人，三者得一，亦算値得；三者苟能兼而有之，則人生之願足矣。」又云：「古人言人生有三不朽：立功、立言、立德；立德乃因以前中國無敵國外患，大家閒散，纔來講這鳥事！」這話在從前的人聽到，會要生氣；如何會將立德看爲鳥事？在我們則可以原諒他，而加以分析，指出他的錯誤。

古人之立功立言立德，只許在其人一生之後由別人來說；**不是一個人打算自己將要去立功或立言或立德**。如自己考慮要去立功，功定不成；考慮要去立言，言亦必不能立；考慮要去立德，則更成爲虛僞。凡有意要去立功、立言、立德，都是不行的。某生把立德看成這樣，那當然只是個裝模作樣而已；所

以他加以藐視而生反感，謂之爲事，於此我要告訴大家一句話，人生是靠趣味的，對於什麼事情無親切意思無深厚興趣則這件事一定幹不下去如我從事鄉村運動，若沒有親切的意思與深厚的興趣，而只想着要立德，立功，那簡直是笑話，而且一定幹不下去立功之人，在他自己不知是立功，到末了由人家看他是立功而已。如有人誤解立功立言立德之說，而自己先打算要去立功立言立德，這是被古人所騙；非古人騙他，而是他自己騙了自己再如我現在不續娶，雖非以此爲樂，亦是甘心情願；倘若要立德而不續娶，那等於由立德而出賣了自己。這最不成功，亦最冤枉不過。

其次再說革命文學與醇酒婦人。這話亦只是說說而已；說這話的人，於此三事都不會成功。把革命排列在文學酒色之間，這種革命那得成功？或算不得什麼革命說這話的人，在革命上實亦不夠格文學亦是如此祇有超過

文學能產生文學；有意乎文學，其爲文學反倒有限因他沒有眞的人生，對人生的酸甜苦辣無深刻體會，所以不會產生文學；卽有文學，亦難產生極有價値的偉大作品說這話的人彷彿有一點文人的味道，同時也可以看出其內部力量並不大，所寫的也恐怕只是一點頹廢的文字而抓不着什麼人生的或社會的意義至於醇酒婦人，說這話的人亦不會成功。一個人如果打算我將這一生沉湎於酒色裏罷，他勉强去求未必得到。卽得到，那意思也很薄了趣味怕有意追求，追求則趣味沒有了醇酒婦人只是一種豪舉，在這豪舉上亦可讓人拍拍掌而已但這要豪性人碰到機會纔有此豪舉，非求可得。如有人說醇酒婦人多麼好，痛快地樂一下吧！其結果可以告訴他：『你一定失望，一定會感覺得索然無味，一定會厭惡棄絕』就因爲原係豪人之豪舉，不能模倣，不能追求；一追求，什麼都完了！所以說說這話的人亦只說說而已，在他

都不會成功

在某生因對立德誤解，由此而生反感，我們從他這反感上看去時，可以看出傳統觀念在他身上很少從社會方面來的壓迫，在他身上有力量來表示不服本來在這時代因襲勢力已經衰退，對個人已無多大壓迫，青年人之反抗亦非難事但究竟於此還可以看出有點力量，還可以看出高強的不平凡的心理這是可取的一點至於對革命文學醇酒婦人的想望，此係從其不健全心理發生的他大概是感情不舒快而要求舒快，不覺流露出來除此之外沒有旁的這完全屬於一時感情作用，產生不出什麼結果所謂健全心理，是沉着有力的、統一的，不單有感情，而且有理智，有意志由此健全心理發出來的念頭、纔有力量，纔是自由的、統一的若只從片面感情求舒快，其本身方陷於問題中而無法超脫，這不是自由的，這是生命的歧途；值不得我們的同

情的

一般人對道德的三種誤解

按我的解釋，道德就是生命的和諧普通一般人對道德有三種不同的誤解：

（1）認道德是拘謹的。拘謹都是牽就外邊，照顧外邊，求外邊不出亂子，不遭人非議，這很與鄉愿接近。所謂道德，並不是拘謹；道德是一種力量，沒有力量不成道德。道德是生命的精彩，生命發光的地方，生命動人的地方，讓人看着很痛快、很舒服的地方，這是很明白的。我們的行動背後都有感情與意志的存在（或者說都有情感要求在內）。情感要求越直接越有力量；情感要求越深細越有味道。反過來說，雖然有要求，可是很遲緩，很間接，這樣行動就沒有力量沒有光彩，還有情感要求雖然是直接，可是很粗，也沒有味道。

（2）認道德是枯燥的普通人看道德是枯燥的，彷彿很難有趣味，這是不對的。道德本身就是有趣味的，所以說「德者得也」；凡有道之士，都能有以自得——人生不能無趣味，沒趣味就不能活下去。人之趣味高下，即其人格之高下，——人格高下，從其趣味高下之不同而來；可是都同樣靠趣味，離趣味都不能生活。道德是最深最永的趣味，因為道德乃是生命的和諧，也就是人生的藝術。所謂生命的和諧，即人生生理、心理——知、情、意——的和諧；同時，亦是我的生命與社會其他的人的生命的和諧。所謂人生的藝術，就是會讓生命和諧，會作人，作得痛快漂亮。普通人在他生命的某一點上，偶爾得到和諧，值得大家佩服贊歎，不過這是從其生命之自然流露而有，并未在此講求。儒家則於此注意講求，所以與普通人不同。儒家聖人讓你會要在他的整個生活，——舉凡一顰一笑一呼吸之間，都佩服贊歎，從他的生命能受到感

動變化他的生命無時不得到最和諧，無時不精彩，也就是無時不趣味盎然。我們在這裏可以知道，一個人常對自己無辦法，與大家不調和，這大概就是生命的不和諧、道德的不夠。

（3）認道德是格外的事情，彷彿在日常生活之外，很高遠的，多添的一件事情。而其實只是在尋常日用中，能夠使生命和諧，生命有精彩，生活充實有力而已。道德雖然有時候可以發揮為一個不平常的事；然而就是不平常的事，也還是平常人人心裏有的道理。道德並不以新奇為貴，故曰庸言庸行。

道德爲人生藝術

普通人對於道德容易誤會是拘謹的、枯燥無趣味的、格外的或較高遠的，彷彿在日常生活之外的一件事情在我看，道德可從兩方面去說明：一面是從社會學方面去說明，一面是從人生方面去說明。現在我從人生方面來說明。

上次所說的普通人對於道德的三點誤會，由於他對道德沒有認識使然；否則，便不會有這種誤會。道德是什麼？即是生命的和諧，也就是人生的藝術所謂生命的和諧，即人生生理心理——知情意——的和諧；同時，亦是我的生命與社會其他的人的生命的和諧。所謂人生的藝術，就是會讓生命和諧，會作人，作得痛快漂亮。凡是一個人在他生命的某一點上，值得旁人看見

佩服，讓大家可歌可泣點頭崇拜及感動的，就因他在這個地方，生命流露精彩，這與寫字書畫唱戲作詩作文等作到好處差不多。不過，不學之人可歌可泣之事，從其生命自然而有，并未在此講求；可是在儒家則與普通人不同，他注意講求人生藝術。儒家舉人讓你會要在他整個生活舉凡一顰一笑一呼吸之間，都感動佩服，而從他的生命受到影響變化。他的生命無時不得到最和諧，無時不精彩。以下再來分疏誤會。

說到拘謹，記得在民國十三年時，太戈爾先生到中國來，很多朋友要我與他談話，我也本有話想與他談談，因他那裏人很多，所以未去。等他將離北平時，徐志摩先生約我去見他，并爲我們作翻譯。我們到他住處時，正值太戈爾與楊明誠先生談宗教問題，楊先生以儒家爲宗教；太戈爾則說不是的。當時徐先生介紹說：梁先生是孔子之徒。太戈爾說：我早知道了，很願聽梁先生

談談儒家道理當時我亦沒有什麼準備，只零零碎碎的談了一些話。太戈爾以爲宗教是在人生的深處有其根據，所以能夠影響人；尤其是大的宗教，影響更大，不但傳得久遠，而傳播的範圍也很廣；可是儒家的孔子不是這樣，彷彿他在人生各方面事情上講究得很妥當，像是有部法典規定人生如何去作，如父應慈，子應孝，朋友應有信義等等，這些話都很妥當，四平八穩的，可是其中離生命很遠。於是太氏很奇怪儒家在人生中沒有發生根據，而在社會上能與宗教有同樣長久偉大的勢力！我當時向他解釋說：「孔子不是宗教，是對的；不過許多人從倫理綱常中去看孔子，也不很正確。因爲這是從社會來看儒家，不是從人生來看儒家，而殊未留意到孔家本學派原來所看重的在個人人生，而不在社會。我就引論語一段文字：「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

這段文字內，可以看到孔子爲學，是着重自己的生活，并未說到社會。又如孔子稱顏回之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都是說個人本身的事情。這裏應該認識清楚的，卽是如要側重社會，就要個人還就四面八方的關係。如果儒家是從社會方面來看他的學問，那麼一切都應該從四面八方去還就；而他不然，只着重其自己。至於看重倫理，那是後來發展的結果。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孔子對於狂狷雖不很滿意，然如更高的中行不易得，則他寧願仍要狂狷。所以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氣很大，很豪放，不顧外面；狷者很拘謹，對裏面認眞。兩者相反，而皆不平穩。但都是眞的。同時孔子所最不高興的是鄉愿。如謂「鄉愿德之賊也」。又說：「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鄉愿乎！」我們想像孔子與什麼人都合得來，而獨對於鄉愿表示這樣不好的感想。鄉愿是什麼？卽是他沒有他自己的生命力量，而在社會上對四

面八方都應付得很好，好像是平妥而實不是眞的平妥。狂狷是兩極端，一個左傾，一個右傾，是兩個不妥當；孔子寧可要這兩個不妥當，而不要那假的妥當。」這個表示與太戈爾所想像的儒家距離多遠！太戈爾聽我說過之後，很高興的說：『我長這樣大沒有聽見說過這個道理；現在聽梁先生所說的，心裡才明白。』這時應明白儒家是要生命爲有力的發揮，且要眞的狂狷有好處，卽在從其生命眞處發揮出來之故以拘謹看道德看儒家，這是沒有看得明白。

看道德是枯燥沒趣味，這也是錯誤。如了解道德是生命的和諧，則其趣味最深最永。所謂德者得也，的確如此。凡有道之士，必都能有以自得。如以無趣味看道德，完全是隔膜。我曾說過人生靠趣味，無趣味則活不下去。人之趣味高下，卽其人格之高下，——人格高下，從其趣味高下之不同而來。可是，都

同樣富趣味，雖趣味都不能生活道德、就是頂好頂永的趣味。

道德也不是格外的。記得梁任公先生胡適之先生等解釋人生道德，容易說小我大我的話，以為人生價值不在小我上找，而要在大我上找，他們的用意好像在說道德是格外的，必須把『我』擴大，才可把道德收進來。這話最不對！含着很多毛病。其實『我』不須擴大，宇宙只是一個『我』，只有在我們精神往下陷落時，宇宙與人才分開。如果我們精神不斷的向上邁進，生命與宇宙通而為一，實在分不開人家與我。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時實分不出我與他，分不出那是大我，那是小我。『我』是無邊際的，雖然道德讓我們為人類社會着想，然而非格外的，等於我身上癢，我要搔一搔而已。

新年的感觸

元旦早晨所講『過年的哲學』的意思沒有說得好，不容易明白，甚或有誤會我要很實在很痛快地去樂一下，所以現在再將我心裏所要說的話說一下。

我歷次看到所開的同樂會，都感覺沒有一次作得好，大約因爲我們平常生活沒有對，所以無論在甚麼上所表露出來的都不好，所以我歷次在會場上的感覺都很難受演劇沒有演好，即講故事說笑話亦沒有講說得對我差不多在每一次有這種舉動之後就留有一種不好受的味道，兩三天纔能過去今天起來，這種不好受的味道又呈現心頭，現在想起四句話可以幫助明白我的意思。

第一句——『樂不難，樂之後不苦難』不但在樂之後，卽在樂之中間也會感到悽涼。老是燈紅酒綠熱鬧不散，仍然是苦，能於樂之後沒有旁的味道就對了。

第二句——『行動之後無後悔難』就我自己來講，我的內心生活常常不調和。從那裏見出？從行動多悔見出從行動多悔中，一面固可見出自己向上心沒有麻木常常自覺，——覺得之後又不好過；一面也正可見出許多毛病常常在不調和不一致之中。

第三句——『奮勇之後繼續難』於奮勇之後而能繼續，這個奮勇纔不是勉强的，而是自然的，得到了生命的自然韻律。但這個在普通人很難能沉着持續。

第四句——『人活着不難，活着不生厭離之感難』沒有厭世之心很

難。我自己就是從年紀很小時對人生曾動厭離之感。大概能夠在生活中不是太麻木、糊塗渾混，而又能不生厭離之感者，這個人生大體算是不錯。反過來說，人生都是容易動厭離之感，這就證明其生活未曾弄得妥當，其感情通通沒有用得正對。

以上四句話，便是我心中的味道，便是使我欲樂而不得。就像關於演劇一事，在我差不多有一種理想的要求而老不能滿足，所以已看過的劇，總覺得是不對，沒有一個使我滿意的。不滿意與未滿意不同，未滿意的話，意思很寬鬆；不滿意的話，是覺得根本不合適，覺得劇中的意思太淺，精刻薄人而使人發笑，這很不好。我差不多沒有看見過一個合適的劇，可是我並不是根本否認戲劇的價值。彷彿沒有一種爲我所理想要求的劇本，但我只能要求而不能作。我更覺得這種對白話劇，除了表見一種緊張的情緒和譏諷滑稽的

趣味外，似乎不能表見另外更深的東西。話劇太現實，太理智，於發抒表達眞情感似乎是不夠。我對戲劇文學沒有用過心，這不過只是有這種意思感覺而已。再則我對舊劇看過了之後也很難過，也給心中存留一種不好受的味道。這味道是什麼？彷彿覺得這是人類的恥辱似的。所以說「樂」「玩」也不是容易的事。必須在人生的根本上弄對了，然後才能幹甚麼都對，才能有眞樂趣！

談生命與向上創造

談到向上創造的問題，必先明白生命、生命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在這裏第一要說的就是生命和生活是否有個分別？

生命與生活在我說實際上是純然一回事；不過為說話方便計每好將這問題打成兩截所謂兩截就是：一為體，一為用。其實這只是勉強的分法，譬如以動力言：離開動力便不能活動，不能活動就是沒有動力，本是一回事。宇宙之所表見者雖紛繁萬狀，其實也只是一回事，並無體用之分。猶如說：我連續不斷的生活，就是『我』不能將『我』與『連續不斷地生活』分為兩半生命與生活只是字樣不同，一為名詞，一為動詞而已。

『生』與『活』二字，意義相同，生即活，活亦即生；惟『活』與『動』

則有別耳輪轉，『動』也，但不能謂之『活』所謂『生活』者，就是自動的意思；自動就是偶然，偶然就是不期然的一下，說不上為什麼自動亦如此，即從此開端動起——為第一動，不能更追問其所以然；再問則為外緣矣

生命是什麼？就是活，就是活的相續，平常人的感覺着有個我，這都是人劃的範圍，不是實在

(註)柏格森言生命為『一個活到底』佛家與柏氏不同，言為『相續不斷，頓起頓滅，完無有物，我只是前後不斷的現』羅素與佛家意同，言帽子一剎那一剎那的表現，你看見的帽子，不是一個，而是無數個不斷的帽子，看帽子為一個，僅是一般人的看法。在這點上我是同意於佛家的

『活』就是『向上創造』——向上就是有類於自己自動地振作，就是『活』；『活』之來源則不可知，如詩文書畫與來從事，則覺特別靈活有神，此實

莫名其所以然特別靈活就是指着大的向上創造，最少機械性。雖然在人的習慣上，其動的方式可以前後因襲，但此亦算得特別靈活，因爲它是促進創造的。

一般人大都把生活看作是有意識的，生命當作是有目的的，這話是錯誤的。整個生命的本身是毫無目的的。有意識的生活，這是我們生活的表面；就時間言之，仍以無意識生活爲多，自己覺得好像有目的，其實仍是沒有目的。分別目的與手段，只容易用在瑣碎的生活上；就整個生活說，沒法說目的，——實在也沒有目的。如果要有目的，在生命的開頭就應當有了，後來現接上去的就不是目的。凡以爲生命有目的的人，至少在他心裏有「我」及「目的」兩件事，這是因他並沒明白目的是怎麼一回事。目的是在做成功一個生活的習慣，這個習慣是權且如此算的，是不通的。向上創造就是靈活奮進，

細分析之可有兩點：(一)向上翻轉，(二)往廣闊裏開展生命(或生物)自開頭起就是這麼一回事，一直到人類——到現在的人類，仍是這麼一回事。生物進化史、人類文化史，這都是表明他們向上的發展、活動的擴大，以至現在我們要好的心、奔赴理想的精神，這都是證明生命的勝利。但這個勝利，不是開頭就規定如此，再來奔赴；今後的歸趨，仍然是不能有一個究竟的！

生命從開頭去開展創造很難，沒有法子一蹴的上去。必須逐步開展，走上一步，是一步；這第一步就算寫到賬本上了，把第一步交代（對自己有交代）給最省事的方法上去——即機械性（前後因襲），則這一步在生活裏面就不用再去操心了。這就是省力，省出力量再向前開展，一步步向上創造，一步步的發展，一步步的機械化，一步步的省力，再一步步的開展。生命就始終是如此無目的的向上創造。雖然人類心理是趨向於求明白、求眞理，但這

都不是絕對的，是一個比較，是一個趨向，在趨向本身說，不能算是目的。

杜威思想的缺欠

杜威思想的缺欠，粗看是不容易發見。中國儒家的根本觀念是生命，杜威的根本觀念也是生命，所談者完全爲一回事。杜威所說的話，也沒有一句不合乎道德的話；但比之儒家，究竟覺得他認識不夠，思想不到家。他的缺欠在那裏？就是他的話雖然不背道德，但並沒有發見生命的眞價值。比方問：「生命本來是求進步的，但爲何求進步呢？」杜威就回答：「生命本來是求進步的，進步就是更有效率，就是要求效率增高。」但如果再進一步地問：「效率增高又是爲的什麼？」一般人一定會答做：「人生原來是有許多要求，效率增高就是爲的滿足人生的許多要求。」在杜威則答：「效率高是更求進步，因爲人生本來是進步的。」他總是始終這樣循環的說法，所以他的

話雖合乎道德，但沒發見道德律——人生價值之基點在儒家雖與杜威之意相同，但往下尚有所講，即講智慧反用於自己身上，使生命成為智慧的，而非生命役於智慧在杜威往下則無所講，他正缺少了一面他只發見了宇宙之用，而未曾發見宇宙之體；只見宇宙之變，未見其不變；只見其相對，未見其絕對這是他比儒家認識不夠和思想不到家的地方。

談民族衰老

現在很有人以中國民族衰老爲憂。這是將社會生命民族生命和個體生命一樣來看的緣故。在我覺得社會生命和個體生命不同。個體生理的現象說，有初生、幼、壯、老、死；而社會現象則不如此，它是時時都有生死，是一種新陳代謝的作用。所謂民族衰老，這是就文化說的。文化是有新興的、古老的，而民族則沒有新降生的民族；只能說某民族的文化是新興的或古老的。美國邁耳文氏所著『社會學原理』一書，卽對此問題有所研討，他大意說：「從文化上看各民族都有少壯老衰各時期，最後不是自己破壞，就是被異族摧亡，民族亦隨之衰敗。」所以，如果中國文化是太古老，民族生命亦必隨着走入末路。但中國民族就能這樣下去了嗎？在我覺得：我們的鄉村建設運

動，就是在做中國文化重開二度之花的工夫，就是從事文化再造、民族再造。個體生命的生理上的一套組織構造，無法改造；而社會生命則基於文化之成長，文化是基於社會事實的進步與民族意識的灌注，故可再造。如日本維新就是日本的一度文化再造。個體生命不能改造，故無法打破生理上的限制；文化可再造，故民族生命能培植新機。所以我們不應以民族衰老爲念，而應謀所以再造文化之機！

文化改造與教育

中國問題是什麼問題？乃是文化的問題。此文化問題，其內容包括了政治、經濟、文化（狹義的）等等的問題，而他們又很實在的融成了一體。所以此問題是一個實際的問題，不是空洞的問題。然則，文化問題由何而來的呢？是由比較而來的。即是由於西洋文化魔力之大，整個地球幾乎都給他征服了；中國當然不能例外，所以也被西洋文化撞了進來。於是弄得我們頭暈眼花，比較之下，我們什麼都不如人家，這才喚起了民族自救運動，民族自救運動，從起頭說，固然帶有對外的性質，但根本還是自己文化改造的問題。考中國文化二三千年來，幾乎完全盤旋停頓，一治一亂，往復循環。若無西洋文化挾其萬鈞之勢，闖進門來，絕不會發生今日這個問題。但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

比較，乃是因其「過之」而非不及。正是因其「過之」，故有所缺漏；所以說中國文化需要補充，不特補充，並且有改造的必要。

文化改造時期的教育與平時教育有什麼不同呢？平常時候的教育是怕文化失傳，要綿續文化。當文化要改造時，不是怕他失傳；反是要他失傳因爲我們此時是要一個新的文化出現。比如老百姓歷來就是不過問政治而居於被動地位，現在則要他有自己的意思而轉爲主動，其被動的習慣道理及知識，都得拋棄。即以種棉言，要採用新種子新種法，即須去掉舊種子舊種法，就因他是相反的緣故

眞正的力量要從鄉村才能醞釀得出來

民族自救運動之對固有文化起反感，是一定的，沒有法子不這樣。開頭大概非起反感不可，慢慢的再折回來。這原因就是我常說的，中國文化到了清代很腐敗，內容很不行，完全失掉了中心信仰——人類精神因之禮教成了硬殼，硬固而虛假，對於眞的自己精神沒有把握，所以才盲從的跟着外來的走。聰明活潑的人，拿了中國與西洋比較看，就一定討厭中國固有的；但如果這個人不墮落，過幾年。他總會漸漸明白中國固有文化也許有人對中國固有文化，覺得很有把握，很固執着，但也沒用。因其拒絕新潮流，終是沒法固拒的。非等到社會轉變，轉到大家都有覺悟時，沒有辦法。這個覺悟自然要天資高的纔能。但我說這覺悟，不是就個人說，是就社會說。這種覺悟恐怕不

在大江及沿海地方，大約先在內地發動，要比較心氣從容一點的人才可以見得到中國問題已十分嚴重，怎能不着急！可是心急的人，決不會發生覺悟，完全頑痺的人自然也不行。我於『一二八』之後到滬杭去，見上海生活老是匆匆忙忙的，這樣恐終不會發生眞的覺悟。因爲他老要求一快的辦法，越要求快越沒有辦法，因他對這個『文化病』完全不了解，眞的力量恐怕只有在內地鄉村社會中慢慢地醞釀，纔能發生大的力量，而後再影響於都市

中國民族的力量

舊曆元旦在上海訪蔣百里先生，談談關於大局的情形蔣先生曾在日本學陸軍，其軍事學在國內很知名他大致說國際局面轉變很快，不必輕易悲觀，也不必輕易樂觀。他對東四省之失掉及華北問題，不視爲什麼大不了，以爲國際局面變化很快，幾年之後說不定可以拿回來不過雖因國際局面變化快，可從外面給我們以機會收復失地，但還要看我們自己有無辦法。

他研究中國歷史，看到這麼幾點：

(一)中國人以整個國家而成功一種力量，能夠如何如何，這是很少的；中國一個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是從地方起來。

(二)中國人在武力上不見優長，談不上有武功；但中國從自衛而發揮

武力，每每能夠戰勝。

(三)中國人在種族上無狹隘之見，祗在文化上有信念，不肯放鬆。中國人爲種族而抗爭者少，爲文化而抗爭者多。中國被外族征服，非從種族而有感想，乃是從文化而有感想，不甘心文化之滅亡。

他判斷中國復興，是從地方的力量起來，爲文化而鬥爭。他又說全國形勢以山東爲最重要，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的時候，他曾向袁世凱說過，別的可以相當的讓步，惟對山東必須設法保全。外國烏德將軍也特別講山東之重要及好處。所以他對山東特別抱希望，希望從山東發出剛才所說的力量，從這自衞文化的戰爭力量而得到一個中國的恢復的根基。我聽了他的話以後，有很多感動啓發。

他對地方有力而國家無力的意思，頗爲有所發明，以爲整個國家無力

而地方能表現力量，是因爲中國人對國家不親切，而對地方是親切的原故，本來在打仗時要緊的條件，是要兵士心理淸楚爲什麼而打仗，在這一點若能認識親切，心中發出點力量，戰爭就有把握，否則不容易成功，而會失敗至於有旁的優勝條件，當作別論，但心理的條件始終很重要。我聽他這一點意見，很合乎我對中國歷史所觀察的，我常說中國不像國家，而祗是一個社會，是一個文化體，同時我把後面兩點加以引申，爲何爲文化自衞戰爭而能得勝？這因爲理性發達的結果，所以種族之見少，而天下一家之意多，尤其是中國的社會很散，故不與人作對，彼此間的疆畫界限不嚴，同時因理性開發，對固有文化所含之理性很寶貴，稍有頭腦的念書人，對固有文化的寶愛很强烈，如宋明之末，許多殉難的烈士，與乎未能殉難而作遺民的，他們對國亡固有很大的感慨，而他們心中還有更强烈的問題，就是文化問題。中國人對文

化親切，對種族不很親切，故其自衛有力量自衛有力量，也因爲是農業社會。農業社會與游牧部落不同，游牧民族幾乎以侵畧爲生涯，農業社會則偏于保守，故於自衛有力量。地方、文化、自衛三點也是相連的。這三點在戰爭時能讓兵士感到親切，則使其發生力量，大概有把握。戰爭不止一次，人家的優長點，在一次表現在二次三次表現，但不能永遠表現我們的優長點，第一次不表現，第二次可以表現，第二次不表現，第三次可以表現，它不能永遠不表現在心理上之優長點，總有一次表現，可制最後的勝利。所以要緊的是現在要作訓練民衆的工夫，預先奠定文化自衛的心理基礎，用不着預先存一種狹隘的感情的仇恨心理。要培養其理性，使其頭腦開發，問題來了，一指點就明白。

在戰爭上本來心理的要素與物質的條件，二者都重要，不能單從心理方面上說，天下事原都是相對的，必無絕對之事，所以心理條件不能說得太

重但是心理條件要列在物質條件之先，因為先要有活的人，才能有物，人是主體，物是工具，主體不能不在工具之先也。下面就事實來說明這意思。

這次由上海到廣州，來往都乘飛機，較上次由廣西到廣東坐飛機感覺苦，因為時間太長，機上雖不震盪，可是聲音太大，用棉花塞住耳孔還不行。我大體精神上還行，同行者都不行，一個年青身壯的西裝少年，氣概很了不得的樣子，但飛起五分鐘後，即嘔吐不止，我還幫忙照拂他。另外一人上機即睡覺，至於我只顧看風景，很替他們歎息，這樣好的風景不能看。我的身體不一定比他們好，我平常坐船也不暈，不管風浪怎樣大，嘔吐的事從來沒有過。我看暈船與暈機，都是心理問題為多，甚麼事都怕心慌意亂，怕自己給自己暗示，暗示就無辦法，從暗示引起一點事實，由事實更給以暗示，輾轉循環，從心到物，從物到心，但開頭還是心，若開頭心理坦然，物就不來了，最怕自己心慮，

自己暗示。或者是需要相反的暗示，就是不怕，要氣壯．

心理的要素，其轉變人的力量很大，從催眠術及其他一類的事情也可証明此理。我看見很多次催眠術，從催眠術治頭痛牙痛及婦女種種病痛，它未能治別的，只能轉移心理。我最初看催眠術，在民國元年，作催眠術的是熊飛卿，地點在一個大戲院裏，他拿小孩實驗得很多，其中有兩件事：一件是將小孩催眠後對他說：『屋中生火，很熱，』小孩也說『熱，』說『脫衣服，』小孩就脫衣服，說『熱得很你出汗，』小孩就現出很熱的樣子果然出汗——那時正是冬天，戲院中並未生火，這是一件。還有一件是他對小孩說：『把手舉起，我不說放下，不要放下。』於是教很強壯有力的警察去搬都搬不動，其實這些沒有旁的神妙，都是心理的作用。還有曾看過一本雜誌，那上面說，印度有一怪人，仿佛是有魔術的人，他有種種怪事，其中之一怪是吃任何毒藥，吃

過了都無事把這怪人帶到歐洲去，許多醫學家用種種毒藥發他喝，都沒有毒死，醫學家簡直莫明其妙，不知爲甚麼這樣强烈的毒藥到他腸胃裡面不生變化。這許多的例，在我解釋，都是心理的關係。我常說中國人與印度人都是拿人類所最優長的理智這一點——卽冷靜的了解的知識之知，超脫於感情之知——不往外用，而用在生命本身上，以了解其本身生命，所以所有中國印度的學問技術創造都是從此開出的，也可以說中國人印度人在心理的開發創造上大而且多。我想這許多關於人生修養的學問，現在人或尙未發覺其重要，要在人類社會改造後，經濟制度有好的安排，大家吃飯問題有了解決，心裡安，才能轉移過來研究人生修養的許多問題。

幫助理性開發的是經濟

社會上許多罪惡，都是從種種條件之下形成的單去責罰一個人或一部分人，也可說是愚蠢。

殺人是現在的制度，此制度在現在尚屬必要。此必要雖並無道理，但此必要，尚無他法可以更換替代。我曾說過，沒有一種可以稱爲好的制度，只有一種比較合適可行的制度。我們不能因其是好制度，就用得上牠，同時也不能因其不好而可以隨意捨棄牠，制度乃是一種必要。提到土匪不殺而教育他，感化他，當然比較好。可是爲什麼不用一個好的法子，而倒用一個不好的法子呢？這就是人命在現在尚不值這麼些錢——這是一句眞的話。所謂殺人是現在制度的必要，沒有旁的，爲求社會的安寧，而又要省事合算，在現在

沒有比用槍斃的法子能更省事合算的了。省事合算是一個無道理的道理。現在省事就是道理，就是很有力的道理，這社會眞不知爲省事曾抹殺過多少道理！

殺人是制度，不單指刑法，並包含了戰爭。戰爭在現在算一個制度。人類以戰爭解決問題，頂不合道理，天下直沒有比這更不合道理的，然戰爭却成爲現行制度之一。在我並不相信戰爭在人類爲不可少，殺人爲不可少；我正是相信戰爭殺人在將來必是可少的，牠的存在並不是我願意。但是在先牠並不必因我願意而存在，今後也並不會因我不願意而不存在。

有人誤會我反對物質文明，反對工業；我並無此意。我對物質生產增加和生產技術改進，原是看得很重的。我所以看重他的意思，則在於非這樣不能給我們挪出更大的閒空，非這樣不能使文化更日進於高明。大概經濟越

發達，社會越進步，對一切問題越可以採用細緻的辦法。細緻的辦法，是從富力增進來的唯有富力增進，可以採用細緻的辦法——如教育等，人命才值錢。

經濟的進步，我們看得很重，唯有經濟進步，才讓我們的生活能更合理。人類雖是理性動物，但理性之在人類，不論其在個體生命或社會生命中，其開發都是漸次的人類社會的組織制度，也是要漸次的才能入於一種合理的安排，卽漸次的把理性開發出來而能幫助理性開發的，則是經濟

制度與經濟

本來一個社會的制度，就是爲事實而想的辦法，故必事實到了之後，纔能產生新的制度。中國現在却是不幸得很，因爲她的制度，並不是依事實才想出的辦法，反都是忘記了自己的事實，僅看見他國的表面——如法律、制度，及一切完備之設施等，——便想全盤採用，希望能突然湧現出新制度來，那怎能成功呢？所以，如果要成功一個新制度，非先從造成新的事實上着手；不可換言之，即非先解決經濟問題不可。良以經濟是事實的主要部分，是事實的骨幹；想有公共組織，必先使其經濟生活的關係能達到公共聯合的地位，而後可。若各自謀生，不需要公共生活，則公共組織便不會成功。因爲經濟進步，能使人類的物質生活，越來越相關聯而不能分開；並且因經濟生活的

連帶關係，遂相隨而發生政治上的公共組織。總之，經濟上越分業越進步，分業越多，則彼此互相需要而不能分離者亦愈甚，亦即是人類關係密切的程度相隨而加高，有如密織之網；既集衆人於一塊，故須有公共組織以解決公共問題，社會之公共組織於焉以成。反過來說，中國以前社會之所以散漫，即因其經濟是自足自給的，故可以散漫，而不需要公共組織。現在我們想要創造新的事實，自然是需要新的經濟；經濟進步然後人民纔有餘裕來參加政治，人人都有多餘的產業、多餘的空閒，大家纔能有機會去作新事業；如此，新的習慣才能漸漸養成，新的行爲纔能發生，而新的制度亦隨之產生。否則，人民生計困難，無錢辦事，無暇問政，一切事業都無法進行。由此可知，今日之辦法，端在新經濟組織形成之一點上。

我們鄉村建設的辦法，較之歐洲則更進一步，歐洲經濟之發展，是以個

人爲本位的，由經濟上的個人而有政治上的公共組織；我們想更進一步，一下手便要有公共組織，從合作主義入手來謀團結，從合作組織來引發民治。這便是從經濟組織引入政治組織這樣多數人共同辦事，本是一條新的路子，在中國社會似乎尙不適宜；然不如此，則人民對於政治不感覺需要，則所謂組織，便將無從組織起所以我們必須於此下一番工夫，使此新路先在經濟上產生，由生計問題將農民牽引到一塊，由促進新經濟之發展，使人民感覺新生活之需要，則此後對於一切行政教育建設諸問題，自會去找；不用催迫，自然會要求參與實行，或比別人替他想的更爲周到如此進一步是自己眞進一步；所謂因下層需要而發動的建設，事權始終是握在下層，可以免掉近代國家的一切危險毛病

農民運動與合作

現在世界完全不能再走從前普通的路子，非給大多數人解決問題不行了！中國的大多數人是農民，誰要解決中國問題誰都得做農民運動；不做農民運動是糊塗的，什麼是農民運動呢？從他的目的一面說，就是謀農民的利益；從方法上說，就是要組織訓練農民，啓發農民自己的力量，使農民自己能解決自己的問題。單是同情是不夠的我們替他們來做是不夠的，以多數人的利益爲心也是不夠的；要緊的不是心而是手的問題——從農民的手裏來達到農民的要求(心)不應僅是經過我們的手，來達到農民的要求，必須用農民自己的手來達到農民自己的要求有的人對農民的利益看錯，所以他們的辦法也就相隨不對了。他們的看法，是注重在農民的物質利益，如

爲農民謀減租謀土地公有、謀加工資等，其實物質只是與利益有關，並不能說物質就是利益然則利益是什麼?利益就是好處何謂好處?對人生有樂趣便是好處，這是我的解釋把物質看成就是人生樂趣，那直是笑話若有人以物質多不作事當作是利益，寧非錯誤之至!殊不知這適足以減殺生趣我們的農民運動也是爲農民謀利益，但非單謀物質的利益，而是要增進農民的人生樂趣凡與樂趣有關的物質方面，我們全都注意然物質並不是我們策進農民運動的目標人生樂趣有兩點:

(一)和氣彼此感情好，彼此能敬愛，大家都忘了自己，能融成一體之情

(二)創造說得平常些就是努力，用我們的身體或心思去幹一些事情，

可得樂趣

若通俗點向農民說，就是和氣與勤儉我們所講的鄉村組織，即着眼在

這一點；我們想從增進他的和氣，以作到生活上的種種合作，合作不應單屬於經濟的範圍，合就是和氣，作就是創造；由此合作，以謀進一步的人生樂趣。

新農業與農業教育

國內一般人都知道農業重要，但有一個共同的錯誤，即在趕緊辦理農業教育。其實這種學校前幾十年就設立過，其對於中國農業改進的效用究有幾何？如其眞有好處，又何待政府今日猶一再命令促辦農業教育？殊不知中國現在所剩的只有農業學校、農業學生、農業教員、及政府中之農林局、實業部，却是缺乏之新。農。夫、新。農。業。

農業是有機的生產，是活動的，因了地理氣候，各有不同。我在金陵大學參觀，他們說：「在南方試驗成功的最好選種，拿到江北種卻不合適，甚至拿到福建浙江也不合適，所以金大在各處設立農場。」這話就是說：「天氣與農業是有密切關係的。」

因此，我們覺得中國應自有其新農業，嚴格地說，各省亦自應有其新農業，此僅就地理上說。至於在沒有就地創出中國新農業之前，農業教師應教的是什麼？學生學什麼？試驗什麼？以及種子農具等，都應該就地而設。

所以此時要講促興中國新農業，不應是多設農業學校，而是要多辦農業試驗場和推廣的媒介機關（如鄉農學校之類）。這兩機關能逗合起來，才可創造出中國新農業。新農業興起，新農夫養成，而後自然有農業教育的需要。總之，必須先有新農業，然後才有實用的農業教育。

談罪惡

一切罪惡，都不在個人，而在社會。其故有二：

(一)武力統治者不以理性待人；

(二)財產私有，經濟競爭人民生活，在社會中沒有整個的安排。

此兩原因，實爲一切罪惡之總因。羅素以爲罪惡是人的生命衝動得不到正當的發育，故有不正當的表見，有如水流受了妨碍。此意與我意相合。武力是直接妨礙生命之流，不合理的經濟制度是間接妨礙生命之流的。現在社會一切都是不對，到處都是罪惡，大家應當發願：「監獄是人類的病態！」應該將其屏棄於社會之外。改良監獄固是必要，但並非根本辦法。根本辦法應當將整個社會制度改造，形成一個敎育的環境，使一切罪惡消滅於無形。

談規矩

前天在火車上，同一位朋友談到濟南齊魯大學醫院的一位外國大夫，他檢查病人，執行他的職務，格外周匝到家，凡事都是按照規矩去做。而中國學生跟他學習的，遇着不在他的監督之下的時候，就不肯按照規矩去做，凡事似乎可省事的就省了。大概規矩就是一種老例，也可以叫做老規矩，老規矩有很多自很久以前傳下來，現在已失去其意義，成為不必要，然後人還在那裏無意義地奉行着。可是，有許多老規矩在後來雖不大感覺其意義而仍歸有其意義者，這樣情形也很多。當然我不敢肯定說一切老規矩至今都仍是有意義的；現在且單就有意義的一方面來發揮。

所謂老規矩大半都是有意義的那個意思，就是：這樣。做。法。既。成。為。一。種。

規矩，在當初一定曾經被人重視過；重視就必定有點道理，當初總是大家都覺得於事實有幫助，才教人學習，循守，然後才能普遍地傳之久遠。大概天才不夠或精神不十分充裕的人，所謂普通人，老規矩可以幫助他，使他所做的事情能夠大體做得不錯，可以夠分數。老規矩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但真有天才或精神充裕的人，卻不一定要按照老規矩作，非如普通一般人非按規矩走不可。大概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技術裏面，先後相傳，於是各行各業就定了許多不同的規矩；一切規矩的由來，都可作如是觀。

中國此刻正在大的劇烈的變化之中，一切老規矩很難得維持人的脾氣，原容易自由任性，自己亂出主意，這也是讓現在一切事情常常見出一種很糟糕、很不成樣、很笑話的現象的原因。現在的西洋人與日本人，其文化當然亦皆在轉變中，但沒有如中國這樣的大崩潰。因此中國人倒只有從外國

學來的習慣規矩還能保留而使用。比如濟南的醫院，齊魯醫院較好，因爲它是外國教會中人辦的，他們做事有他們相傳的規矩，大體上都還能過得去。再如上海兩大書局，一個商務、一個中華，商務印書館便比較穩固。因爲它裏面的創始者，有一個夏瑞芳係教會中人，在做事時立下許多爲後人可以遵守的規矩，所以他就能夠維持得有條理有信用。中華書局雖然也有二十餘年的歷史，但中間曾屢經危險動搖，這就是因爲他們都是一些念書人，於條理規矩上不很夠的緣故。

聽說英國人最重習慣，最守舊，可是英國政治社會各方面常常能夠很像樣，不致很糟糕，恐怕也是從此處來的。日本人也有許多規矩，一直到現在還是不隨便苟且。我聽一位朋友說，中國人穿衣服以及建築，常見中外雜亂糅和的現象，此在日本則不然。他們常是西式就是西式，日本式就是日本式。

闊人們常常是有兩所房子，一座西洋式、一座日本式，但不使之合到一起。進到這一所房子裏是一套生活；進入那一所房子裏另是一套生活，吃飯穿衣皆如此。這話如果是實在的話，那倒是很可注意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爲人類開闢一新歷史而奮鬥

現在不單是中國，即其他各國，關於人生問題，都是在思想紛歧的裏面說到人生問題，有的主張社會主義，有的主張個人主義，尤其關於婚姻問題，更沒有好的解決辦法。在現代時期，問題既多，思想又複雜，恰是一個極混亂的時期。如在印度有兩大勢力存在，一爲新派、一爲舊派；甘地就是代表舊派勢力的，但新派勢力亦甚大。日本情形亦是如此。青年學生多偏新潮流方面；而一般人則多半墜落，尤其老年人莫不咳聲嘆氣，痛風氣之不古，若有不可終日之勢。的確，歷史演到今日，是一個要改變的時期，改變的方向，非有大學問大眼光的人不能看出，一般人只是在迷惑困擾的情形之下過活而已。生當今世，自一面言之，幾乎人人無所適從，易陷於苦悶，易落於犧牲。自另一面

言之，實爲對人類一個試驗；試驗人能否在困擾中站立得穩，能否發揮人之創造力，刺激人之生命，使其活潑，而有力量人生是要奮鬥的，——對困擾而奮鬥；換言之，在前數十年的中國社會，還有一定而呆板的路子可走；讀書人家自幼即專力於攻讀，按步就班，一步一步走去，便不會有什麼差錯，那時問題少，人亦無甚煩悶，除非大聰明的人，才能不爲當時環境所籠罩，思有以改造之耳！時至現代，是到了一個大劇變期，吾人應爲人類開闢一新歷史，此實偉事也，吾人把這個責任負起來，應歡喜踴躍以接受此使命，不要畏難，不要退避。

中國士人的心理

中國人對政權不發生好感，而厭惡，唾棄，這不是現在纔如此的；在歷史上的中國人——尤其是讀書人——都是如此。其來源是因中國人早受理性的啓發，才對强權勢力不給以位置在我覺得，對中國的念書人是很容易辦的，其要點就在你能夠抓住他此刻的心理。當他氣冲上來，心氣不平的時候，你這方面最好不要刺激他，阻擋他，而讓他的氣可以儘量發揮，這是消極的一面；積極的一面，就是他越急燥，你越不坦，讓他急燥，幾分鐘後，他就燥不起來了；這時你有幾句話便可折服他，可以馬上沒有問題。不過，這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在你心中當眞沒有對不住他的地方，沒有說不出來的話。你可儘量讓他生氣，生氣以後就無事了。對個人可以絕對如此。

對於羣衆、其機械性較大、不如個人之簡單，好對付。但亦除去以你自己的利下，去調和他的不和不外，更無好法。

談用人

作番事業，第一困難問題在用人。我常自覺於此很缺短，蓋人的安排最難，因人各有其一副性格脾氣，各有其才分能力，很難將其長短都看得清楚。我很了解自己是最不會對人作箇別的認識的，我對人容易是概括的、分類的、通於一般的看法。但認識人是要靠親切地直覺，不能專靠推論的。概括的、分類的，就不是直覺，而僅是一種理智的推斷。我平常容易看人家好；看見他一點好處，而忘了其他一切短處。我這種心理，固算一種好處，但在不能認識人一方面說，也正是一種短處。

再則，我對事情來了，平常很難有明快的判斷。明快的判斷是直覺的而非理智的。理智是事情來了，往復推想，將這事情放在某一類型中而有所判

斷，其猶疑性最大。直覺是當下明澈事物的特殊性而立下判斷，常能認定不疑。因此，我常覺自己不能作事。

我不能作事而事情責任偏落在我身上，也就祇得勉強去作。於此，在我經驗上，覺得用人有一箇原則可資信守的，即「一人要試而後用」。從一般的名譽，或朋友的特殊保舉，或從自己的一時的眼光看到，而未加以試用的，都不可輕易拿一種責任付託給他；無大責任的事情不要緊，凡獨當一面的責任，一定要試而後用。試一次不見有把握；但不試則更不妥當。這是我多年經過失敗而得到的教訓。大概人一定都有其長處，亦即有其用處，端在安排得恰當與否。所以對於用人，頭一次總難安排得當，必須試而後用；同時要於平素細心考察。

志願眞誠

志願眞誠四個字，話很平常，誰都會說，因爲大家常說這個話，便幾乎沒有味道了；可是實在說，我們往前作事情，要依靠這個意思，我想是對的。因爲我們作的事是一個創新，鄉農學校就是創新之一，不是方方面面已有路可走，而是在什麼都不定，正須去探討摸索創造。此時周圍環境很不順，不順靠什麼能順呢？那非靠我們裏面的勁——眞誠老往前追求的勁，不能通得過去。在創造的時候，如無熱心毅力，稍一碰釘子便將完了。探求新路子的時候，必須靠此必須耐煩；志願眞誠才能耐煩，不眞誠必是敷衍。創造要耐煩，耐煩才能通得過。在此時代，非如此不可。這是一個意思。

再則，我們此刻作事，最大的問題是對人問題，對事問題尙放在第二。大

家下去作事，最先遇到的是對人問題縣政府的人，或我們參加縣政府工作的研究部同學，都與大家相關係，都會發生人的問題對人問題項要緊的是這一點，——眞誠。巧滑的人固然讓人沒辦法，不會被人挑剔，不會與人翻臉，眼前都能過得去，但結果他還是得罪人，大家要討厭他如果是眞誠，就有錯誤，大家也可原諒；到底眞誠人能對付過去，巧滑人則不能。對人問題旣要緊，故眞誠爲必要。所以對人靠眞誠，而對事，則靠技術。不過，許多技術、許多方法，眼前一時用不上。眼前完全是人的問題，故非靠眞誠不可。這是第二個意思

第三、我們作鄉農學校的事情，如果能作得幾分，則必完全靠我們四五個同學的和衷共濟。這個意思很顯明如果這幾個同學的力量互相牽掣，互相妨礙，好像一輛車，一個往東拉，一個往西拉，則一定不行，事情馬上不能作，一定鬧笑話可是這四五個人如何能和衷共濟？那麼，必靠志願眞誠。志願眞

誠，才能把心放在較公的地方（公就是志願）不然，四五個人四五個心，你有你的打算，我有我的打算，彼此的心都不放在較公的地方，則很難相合，所以沒有志願是很難相合的志願眞誠才能顧全大局；爲顧全大局，校長才能照顧尊重其餘四個人的意見，其餘的四個人也能比較尊重這個作校長的人，這幾個人在事情上能尊從校長，校長也能容納這幾個人的意見，此之謂和衷共濟，沒有志願，一定有許多小毛病出來，如順嘴說閒話等，志願眞誠，則毛病可以減少，彼此才能湊到一塊去，四五個人如四下分裂，一定把事弄糟，還不如一個人去作呢！所以我們作事情，最忌的是鬧意見，最要的是志願眞誠。

談組織團體原則

在中國以前的士人，沒有團體，只有朋友，其原因甚多，但根本只在一點：即中國士人理性開發，從吾所好，喜出己見而不信仰一個對象，與宗教正相反，以此，故脾氣很大，越是有頭腦有才氣的人其個性越強。這樣，想組織成功一個團體（黨），實在是一個大的困難。

中國以前的士人是如此，現在的知識份子，也沒脫掉這種習氣。但作社會運動，必須以團體來作才行。那麼，我們想要成功一個團體，從那一點上來相結合呢？在我想，絕對不能像外國只拿一個主義主張來結合，拿一個主義主張結團體，是強人從我；這個在中國大概是不可能。中國士人要想結合團體，大概須完全掉轉過來：在見解主張上可以從容商量，而在另外一點——

志。——上求同必志趣相投才有結合的可能志趣相投，即志同道合，即同有志於人生向上的人在中國只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很難有黨團的組織。依現在的社會運動言，亟需要有組織所以現在組織團體，一面須合現社會的需要，一面又須無背乎中國人的心理沒有共同主張，固難成功團體；沒有共同性情志趣，亦殊難成功團體。我們要想成功一個團體一面要以鄉村建設作我們共同的目標；一面要從志氣上彼此相勗勉，本人生向上，爲尋求師友的根本，不懷成見，不排斥異己必須如此，然後纔能不徒爲表面的結合，而相信相知以及於久遠。

談應付難關

中國近數十年來已甚苦痛，今後將更苦痛不已，歷史演變如此，實無可逃。中國人過去過的都是不穩日子，今後將要過一過複雜嚴重的生活矣！

不過，人生原來是創造的，無有問題便無有創造，無創造將何有新的東西發生？問題來了，正是我們創造的機會到了。從小處說，是我們實驗的機會；從大處說，是我們國家民族的新轉機關鍵之所在。在這時候若能持之以方，不被摧毀，那就是頂成功的了。以我個人想及替朋友想，在這時候只有咬牙奮勉，只有從正面對着問題去奮鬥，絕對是無法躲閃的！

問題本是時時延續着的，奮勉創造亦是時時延續着的，一時的興奮沒有什麼用處，要緊的是能沉着延續！

婚姻問題

一、總說

這個問題很不好談，是個很深的問題，同時所包容的問題亦太多婚姻制度的對面，就是沒有婚姻制度，是包括兩條大道：

（一）斷絕兩性關係——獨身主義者與宗教家之禁慾主義者，都是屬於這一方面

（二）發生兩性關係——甲、承認婚姻制度。乙、反對婚姻制度，不立夫婦之名，男女自由同居，主張自由戀愛者即其中之一派。

此兩條道路，孰是孰非，好難談說！據我看，兩性問題想找清楚頭緒而得一着落，現在還非其時，到什麼時候才得解決？須在經濟問題解決之後，何時

才是經濟問題的解決，卽人類共同對付自然的時候。現階段的經濟制度，不是人合力對付自然，而是人與人間劇烈的生存競爭，彼此的力量，用在對付「人」的上面太多了。現在人類生存還無着落，故不能不衣食是謀，在這時候，想將兩性問題擺得出來條理清楚，實不可能。必衣食問題得有公共的解決，騰出空來，讓大家用心思用力量，來共謀解決。這唯一的當前問題，才有可能。但於此不妨亭我們的眼光，說出一點意見來。

一、獨身主義者與反獨身主義者

獨身主義者在普通眼光看來是不合乎生理的，反獨身主義者批評說：「一個人是半個生命，男女兩個人合起來纔是一個完整的生命。依生物進化原理說，生物之未進化者爲雌雄同體，雌雄異體實爲後來事，故惟雌雄相合才成一完全生命。獨身主義實爲反生物進化原理的學說，在生理上是

無其根據的』在淺表上如此批評，亦自有道理；但往深處去追求，似仍不能如此說一個生命究竟還是一個生命；一個完全的生命，是無所不足，此意甚深。高明的宗教，其操持禁慾態度之眞根據，卽在此『生命完全，無所不足』他是有見於生命的完全而發揮之，此在別人謂之禁慾，在他則不是如此。他之所以反對男女之事，乃是反對自己忘記自己的完全，失掉自己的完全。人在生理上雖然好像不完全，其實不然：每一男性在心理上生理上都有女性；每一女性在心理上生理上亦都有男性；只是都偏一點——都有一點偏勝也有時在兩方面都偏勝不着，形成一個不男不女的人。所以宗教家，除日本本願寺的和尚婚娶外，都是禁慾的。但順遂生命之自然，及爲人類傳續計，當然以結婚爲對。

三、反對婚姻制度的原因

反對婚姻制度的理由何在?即在婚禮。婚禮爲結婚的一種形式,是表明確定男女關係的。此形式之形成,即爲婚姻制度。但兩性關係之久暫,不一定基於婚禮之有無。據是以言,則婚禮究竟有無必要,實爲一大問題。一般人都承認婚禮之發生、存在,是確明關係;換言之,就是拒絕或防止其他關係的再發生。這話單從社會一面看,也對。單從社會一面看,容易把婚禮看成工具,看成是減少糾紛最有用的辦法。把婚禮看作是工具,是方法,則婚禮無疑義的是可廢除或更換的。如果有比婚禮更可以減少糾紛的有效辦法,則婚禮便成爲不必要了。

四、婚禮的眞根據

婚禮之所以發生、存在,雖然在作工具一方面的原因也有,但婚禮之眞根據並不在此。依我看:婚禮本身就是一個目的——人就是要求婚禮,當人

將要結婚時，發乎眞摯的情感，要求有一個鄭重的表示；順乎自然之情，纔有這個懇切隆重的表示，如果沒有，心就不安彷彿學校開學不行開學禮，未免把這種生活看得太不當事了。開學行一個敬謹懇切的開學禮，大家自然鄭重起來，以後才不致懈怨下去；一切都是如此。短一個禮，雖然說不上是缺短了什麼，可是缺短很大結婚更是如此，在男女兩方彼此之情愈眞實，意味愈深厚，則要求於禮者亦愈切，感情亦會因以更加濃厚。所以說，婚禮是出於人情自然要求進一層說，婚禮安排得好，可以啓發他們開始正常形態的生活，其有助於他們的後半生生活者甚大結婚那天的印象於後來很有關係；婚禮沒安排好，實爲後日不幸的源泉。

五、多妻與多夫

與婚姻問題附來的爲多妻與多夫問題。此問題據生理學家在生理上

說或者可以講得通，但我以爲在心理上說，殊無根據且相反的有拒絕多妻多夫的根據這話不是指着嫉妬問題，而是指着『記憶問題』說的。於此我姑且肯定的說：『一妻一夫是眞理』

六、訂婚

與婚姻問題俱來者，爲訂婚問題究竟是父兄給訂呢？抑自己去訂呢？依社會習慣說，大別爲二類：

(一)西洋社會自己訂——西洋社會構造的基本是個人，在中古時代是個人隸屬於宗教，近代則又個人隸屬於國家，處處是個人，這很自然的婚姻亦是個人的事了

(二)中國社會親長訂——中國是倫理社會，社會是由家庭構成的。家裏添一個人與大家都有關係，不過夫婦的關係更大一點而已。訂婚結

，婚姻終是看成家事，不是個人的事，家事得由家長作主（對家長代爲作主，乃是不曾明白中國社會基礎）。

在我，覺得訂婚有兩種辦法：

（一）家庭與個人兼顧——在個人一方面說，婚事爲家庭中事。個人之判別力不夠，應徵得父母同意。在家庭一面說，父母應尊重個這件事與大家都有關係，但子女自身的關係究竟最親切最久！

（二）託之師友——親事本來要由自己選擇才親切，旁人代謀如自己。——但代謀也有相當的理；以自己年輕，選擇能力不夠，每困情感，致誤終身，尤其女子如此，所以如果能找一最有經驗的師友代嘗不好？在我理想的人生，是以人生向上爲第一大事；在這方面，最能的是師友故師友的決定，勝於自己決定（非自己不管，是參酌取決於

他知我長短，很了解我；也同時勝過於父母的決定，因師友於幫助向上方面是勝過父母

七、離婚

離婚可以嗎？在我想原則上是不可離因爲創造是人生本來的意思，伴侶好，固然可以幫助我去創造，夫婦失和，也是對自己向上的鞭策人情要和而不要離，生離死離都不好，輕於離棄是不合人情的西洋社會離婚甚屬平常，美國離婚率約佔半數；似乎還在前進中我總感覺那樣的社會有很大的危險，結果會讓人感覺人生的疲倦，失去幸福。

八、再婚

喪偶或離婚後，可否再婚？此問題與多妻同。卽在生理上有理由；而在心理上無根據，其故卽在記憶人類心理與其他生物之不同，根本在於記憶柏

格森說：『記憶有二種：（一）眞記憶，（二）準記憶。眞記憶，唯人有之；其他生物間有記憶，則準記憶也。』因人類有眞記憶，故在感情上拒絕與第二異性發生關係；假使發生關係，前者的印象卽躍然在目，從現在的情慾衝動，喚起那一個記憶來，這種情境有些不安。此不安很細微，爲一般人所不覺者。

九、家庭制度

大家庭對呢？小家庭對呢？本來這二者各有其長，亦各有所失。大家庭在情誼上說能很洽和，固然很好，但不容易做得到，並會養成倚賴惡習；小家庭較冷枯，但利於創造。西洋人爲小家庭，父子異居，中國則全爲大家庭。在我想，父母在以不分居爲宜，但父母須注意培養創造其子女。

十、命

最後有一個意思要說，就是『命』這個字很難講。不過要知道極開明。

通達深沉的儒家，命的道理是他全道理的一點。比方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談命的時候很多。何謂天命？孟子說：『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這兩句話很恰當。普通人看事情容易有錯誤，覺得事情之湊合，是偶然的。其實沒有偶然的事，只是自己識力太短淺，找不清其前後的因果關係而已。本來，生命是渾然而無空間與時間之可分的。但爲說話方便計，假定用縱橫來說：橫是四面八方，是空間；縱是歷史，是時間；此處此刻的事情，不知是由多少空間的逗攏與時間的推演下來而成的。如我之與大家講話，不知是經過多少空時的極細密的推演，我們在此推演中，不知覺的推到這裏來大家動一念來投考，動一念似是偶然，其實，這一念之動也是有很久很遠的根據在的。人之身體高矮強弱、資質利鈍、脾氣和暴，都是天賦，其實亦是與外邊不能分的。佛家解釋生命說：『一人有一身體，各人

有其宇宙，而彼此的宇宙互相聯通，大家在我的宇宙中，我亦存於大家的宇宙中。——此即佛家之所謂依報正報即爲生命本身。此意是說身體固爲生下來的，而環境也是生下來的。那麼，妻子同我這生命是最近的一件事，我們何可認爲是偶然的事呢！所以如果把歷史大勢看清楚，就可知道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們的生命是極靈活有力，我們的心與宇宙是脈脈相關息息相通，毫無隔閡，一切事絕無糊裏糊塗成功的。我們明白自己同父母的關係，不能設想離開父母可有個我；當然亦不能涉想妻子是外來的，而只有個我明乎此，就是了解天命。那麼，就自然很謹慎小心地來對付（姑用此對付二字）我與我的環境——即我的身體與我的家庭很小心是怎樣呢？即不要失掉天賦我以創造的機會！

談戲劇

我對於戲劇所知甚少，沒有什麼研究，不過我有我的戲劇觀。記得俗語上有兩句話很足以說明戲劇：「唱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這兩句話很好。我雖然不會唱戲，可是在我想若是在唱戲的時候，沒有瘋子的味道，大概是不會唱得很好；看戲的不傻，也一定不會看得很好。戲劇最大的特徵，即在能使人情緒發揚鼓舞，忘懷一切，別人的訕笑他全不管，單是有意的忘還不成，如能連忘的意思都沒有，那才眞可即於化境了。能入化境，這是人的生命頂活潑的時候。化是什麼？化就是生命與宇宙的合一，不分家，沒彼此，這眞是人生最理想的境界。因此想到我所了解的中國聖人，他們的生命，大概常是可與天地宇宙合一，不分彼此，沒有計較之念的。所謂「仁者渾然與物同

體，』便是完全忘了自己，這時心裡是廓然大公的，生命是流暢活潑自然自得的，能這個樣子便是聖人。由唱戲說到聖人，似乎有些不倫不類，其實其中是有些相通的地方。

我覺得人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動物者——也就是人類的最大長處，卽在其頭腦能冷靜；頭腦能冷靜才能分別計算，這就是理智。但人類之最大危險亦正在此，卽在其心理上易流於陰冷，在人情世故利害得失上會有許多計較，化一切生活爲手段，不能當下得到滿足。譬如我講話，假使覺得這是我的職務，是不得不應付，當然很不好；卽使希望大家好，而拿講話作手段，這也是在當下不能滿足，而是一個危險。

心眼多、愛計算的人，就慣會化一切生活爲手段，他的情緒常是被壓抑而不能發揚出來，他的生命常是不活潑，而陰冷、澀滯。這個危險常隨着人類

進化而機會愈多，且更容易發見。反過來說，譬如野蠻人，他們的生命却常是發揚的，情緒常是衝動的，越文明越是不瘋不傻，但也正是一個危險。所以據我推想，戲劇怕是越到將來越需要的，需要它來調劑人的生活，培養人的心情。

在這裏我還可以加說一句話——就是禮樂。我所了解中國的禮樂，彷彿就是唱戲，將人都放在戲中去唱大戲，唱完了戲還完全不知道是在唱戲。所以，我對戲劇的解釋觀察，是看重歌劇，不重話劇，話劇離我所說的意思遠，因其理智分數多，過於情感分數，情緒發揚之意少，與生活太接近，太現實。我覺得藝術就是離現實遠的意思，太現實便無所謂藝術了。戲劇在西洋多話劇，在中國舊日以歌劇爲多，其中恐怕也是這個關係——西洋理智發達，中國情感發達。

在我從沒有看見過一個滿意的戲劇。我對文學藝術之類老用不上心去；可是在我心中常存一個意思，就是覺得這裏面寶藏着很多有意義的東西，値得欣賞。記得在北京開始提倡戲劇最力的，是辦北京晨報的蒲伯英先生，他曾創辦一個仁義戲劇專校，（現在山東省立劇院院長王泊生即當時學生）我常惦記着想去看他們做的究竟如何，希望着他們或會做得好，後來在這學校將停辦的前幾天，公演一次，我曾去看，劇名「闊人的孝道」我看後仍是覺得不能滿足。再後來俄國的旅行劇團到平公演，晨報很替他們鼓吹，我嘗找了一個空閒同張競生先生去看過一次，劇是歌劇，劇情是描述一件古代皇宮中的故事。看過幾幕，我覺得非回去不可，因其是粗野討厭得簡直不堪入目。我很願意有暇能到各處看一下，到底有否我心中理想的戲劇。

談戲

——山東省立劇院週年紀念會演詞——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是省立劇院一週年的紀念日兄弟並不常在濟南，這一次因爲有別的事，於前一兩天到濟南來正趕上參加這個紀念會承王院長之約，不能不說幾句話。兄弟對於文學藝術，素來很少留心，所以對於戲劇，知道的很少，恐怕沒有好的話講，只是很粗的把我對於戲劇的意見，或是感想，少說一說。我們常聽說有兩句俗話：「唱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儍子。」這兩句話，說的很好。我是沒唱過戲，不過以我的推想，唱戲的在甚麼時候唱的最好？我想，大概是在他唱的忘了他自己，忘了他自己是在唱戲，唱的最入神，最得味的時候就最好，可是唱戲的人在戲台上唱的最入神，最得味，忘了。

他自己的時候，也就成了半瘋，如果不瘋，他的戲就唱不好，那麼，看的聽的人呢？大概也是在看的最入神最得味，忘了自己是在看戲，把自己也溶化到劇情裏的時候，看得最好這個時候，大概總得有點傻，如果看不出這種味來，他的戲也就看不好。所以，要唱好戲，必須有點瘋；要看得好戲，必須有點傻。因此就有了「唱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這兩句話，從這裏聯想到，唱戲聽戲的最大特徵，是使人解脫於分別計較，從支離破碎的心理得到很渾然整個的生命，發揚出眞的有力的生命，把一切俗俚瑣碎的事都忘了，這個時候，正是人類生命最活潑、最眞切的時候，這時候，唱的人和看的人的心裏，感覺到最暢快最解脫這種藝術，才是最值得看、值得聽、值得欣賞、值得感動、值得佩服的藝術！進一步說，不但唱戲的人要瘋，看戲的人要傻，就是實在的人生也正要如此，實在的人生也正要瘋一點、傻一點才好。

人類最大的長處是理智，就是會計算，會較量，俗說就是心眼多，任何動物，不及人的心眼多；而人類最大的危險，也就是理智能使生活落於陰冷、沉滯、麻痺。計算是行動之前的心理作用，其他動物不能。但是計算太多了，便會落於沉滯。凡事計算、較量、左右瞻顧，便會至於麻痺。人類至此，是最大危險，而生活也感覺痛苦。這時候最大的毛病，是把一切的生活都一節節的化爲手段，凡事總先想想爲着甚麼的；譬如，爲何念書，爲的是將來作事；爲何作事，爲的賺錢；爲何賺錢，爲的是吃飯、養家、等等。一切都先看看是爲甚麼，把一切都化作手段，生活不能得到當下的滿足，當下的都不是目的，都感不到舒快，這就是到了陰冷、沉滯、麻痺的時候。

藝術正好與此相反，牠處處是發舒、流暢，給人得到當下的滿足。在中國古時，有一種大家都很知道，很看重的大創造——『禮樂』。中國古代的禮

樂、可算一件重大的創造，後代的儒者，也常嘆息說古代禮樂的破壞。眞的古代的禮樂是怎樣，我不知，但我想像當時的禮樂，正是讓人生可以免除陰冷、沉滯、麻痺的危險的一種東西。讓人類都瘋一點，傻一點，把人生當戲唱，教大家都唱戲，學人把大家都放在戲裏，大家都唱，卽是一切都有禮樂，不但是坐朝、吃飯、上祭等，都有禮樂，乃至外交有禮樂，軍事有禮樂，…………使公私生活都禮樂化，把人生都變成唱戲，推其用意，也就是想救人類那種最大的危險。

在人類文化未進步，人還是很粗野的時候，我想一定比後來的人都瘋都傻，文化越進步，人越不瘋不傻。所以在人類文化未進步的時候，戲劇的有無並不要緊，現在人都不瘋了，不傻了，就得唱戲，從唱戲上教人再瘋一點，傻一點，要讓生活有生氣，戲是很需要的，人類文化越進步，越加需要

我個人常有一種感想：戲和哲學，同樣每一個人都很需要。每個人都該懂一點哲學，每人都有點自己的哲學，雖然哲學家很少，不能人人都成哲學家，但最少人人都懂一點。戲也是一樣，人人應該懂一點戲，最好人人唱戲，但也不一定都唱好。最不好的是拿戲當職業。雖有戲劇專家，雖有哲學專家，但不能人人都成戲劇家或哲學家，這只好讓有戲劇天才或是哲學天才的人去作，普通人是不行的，所以不能人人都拿他當職業。人人都懂一點哲學最好，但無需在大學裏辦哲學系，一個人在大學裏學哲學，等畢了業再教別人哲學，這是頂寃枉的。只要人人知道一點哲學，也知道一點戲，就成了。但是這只是理想，不但中國現在不行，在現在的人類社會中，還辦不到。

我很實際的感覺到，有三種人最需要戲劇。——我這裏所說的戲劇包括的很寬，如音樂、詩歌等都在內。那三種人？第一、是近代工業的機械工人。近

代工業是機械工業，完全靠了發動機和複雜的機器來生產。人的精神都用在機器上，很少用在出品上，所以近代工業的工人的生活非常無味。因爲他的一切心思聰明都用不上，有人說現在是機器用人，不是人用機器。所以這種工人的生活最乾涸，這種人需要戲劇。如果這種人不給他機會看戲、唱戲、接近戲，那一定要糟糕。在乾涸無味的生活中，他們一定要找不好的刺激，如喝酒、賭錢，和不正當的男女行爲等等，而造成很不好的結果。不過中國的工業不發達，這種工人還算少，所以最需要戲劇的還是第二、大多數的農人。我個人因爲在農村工作，對於農民生活情形看的比較眞切；現在農民生活的無力、消極、沉滯，實是極嚴重的危機，一方面是兩千年歷史的關係，一方面是眼前環境的逼迫，造成現在農民這樣怕事、消沉，這是極値得同情、可憐的。這種消沉的情形，推演下去，眞是不了。中國現在的農民大衆，不能夠應付現在

的時代、現在是中華民族歷史的大轉變的時候、文化大改造的時候，事事需要改造，而現在的中國農民，則不能夠應付這樣嚴重的局面。正在這改造時候，這種普遍的消極情形，實是不了中國農民受環境的壓迫及因生計困難，所以計算心很切，非常的貪圖小利這是近來一般的農民的心理。中國農民環境如此，心理如此，則農民前途無望；農民無前途，則中國社會也無希望但是，怎樣使農民大衆活潑起來，增加他們的生命力，不致如此消沉、沒落？我以爲，需要戲劇所謂需要戲劇，也不一定是要我們唱給他聽，最好是他們自己唱我們製作一種簡單的、經濟的戲劇，教他們自己唱，漸漸的使農民都開始唱開了他們的戲，農民生活的心理一定可起大的變化，中國前途才有向上的希望。幾十年前丹麥的復興，就在他們的民衆教育能把農民精神活潑起來，而民衆教育則主要的是詩歌與音樂。現在中國的農民也極度需要適合

於他們的音樂與詩歌，也就是極需要有適合於他們的戲教他們唱。如果沒有這種詩歌、音樂或是戲劇到農間去，農民的生活還是這樣消沉、雜碎，怕非到死亡自誤不可。農民自誤，則等於整個中華民族自誤。要想挽救中國的農民，挽救中國社會的厄運，非把能適合於農民環境情緒的音樂、詩歌、戲劇傳佈到民間去不可。第三種人是學生。現在的學校教育，是從西洋教育轉運過來的，注重智識和技能的傳習，對於情緒情操，很少下工夫。只把些智識來灌輸到學生的頭腦，而一點也不注意他們的情緒情操，則這種教育是片面的，不是整個的。音樂、詩歌、戲劇，對他們真是極需要，並且還要讓他們自己唱。

我的意思大概是這樣；以我的感覺，大概上述的那三種人最需要戲聽。說王院長很注意到歌劇的研究與創造，以他內行人的眼光，一定能有所見。國內以公家的力量，而作戲劇的研究、教育的，省立劇院還算最先。最近中央

才在南京辦了一個戲劇專科學校，政府的這種設施是很應該的。現在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大轉變時期，在這大轉變的時期中，極有待於戲劇的研究創造現在大家對於戲劇的注意力還不夠，應該有更大的注意研究，用更大的金錢來創造，才合於現在中國歷史文化大轉變期間的需要。

（此篇雖軼出「朝話」範圍，而因其可與前篇互相發明，故特輯附於後。——輯校者註）

談音樂

看見報上有一個消息，是王光祈先生最近在法國死了，在我心裏很爲悼惜！因這個人是有其相當的價値的，差不多我覺得他是唯一的在音樂上有成功希望的人民國八、九年時，他在北大是發起少年中國學會的人，（此會發起人初爲三人，後爲八人，他彷彿還在三人之列）這個學會當時曾很包容搜羅了一些優秀青年，教授學生都有多人參加，如曾琦、李大釗先生等都是這個學會的分子。後來這學會因其在思想上初無一定的方向路子，乃隨大局的紛歧而分化爲共產黨與國家主義派等；王先生後來自費去歐洲留學，到現在差不多已十年光景。他最初並不是研究音樂的，其歸趨於音樂，乃是後來的事。在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雖都曾出版了幾種關於研究音

樂的書，但俱非大著。他最近十餘年來的生活，大都寢饋於音樂上。我同他雖不很熟，但很能了解他。

在國內對音樂有研究有創造的人眞是太少；這種東西，必有眞的天才纔能有深厚的造詣。我對於音樂歷來是看得很重的，因爲它可以變化人的心理，激勵人的人格。我覺得中國之復興，必有待於禮樂之復興。依我理想的社會組織，其中若沒有禮樂必至成爲死的東西，所以我盼望有音樂人才的產生，沒有音樂人才產生，眞是沒辦法！我的朋友衛西琴（他自名衞中）先生曾說：『人的感覺如視、聽、味、觸、嗅、等，以觸覺爲最低等，以聽覺爲最高等。所謂最高等者，卽言其花樣最複雜，而與心最近，與智慧相通，影響變化人之人格者亦最快而有力』確有見地。

我沒有經驗過一次好的音樂。衛先生本是專門研究音樂的，他在太原

時，曾經用中國詩經中之幾章譜成樂，樂譜不是他的獨創，是自永樂大典中傳出來的。他特別訓練了一班學生，用中樂將它表演出來。民國九、十年間，全國教育代表聯合會在太原開會，衛先生遂領着他的學生，演奏詩經譜成的樂曲，參加教育會的陳竹素先生歸來說：「這種樂，眞是可以代表中國民族精神的一種樂，平生未嘗聽過，但聽過一次，一生也不會忘記。」可惜後來衛先生的學生很難湊合，我未得一聆雅奏。不過，衛先生所演奏的西樂，我卻聽過他演奏時的精神，頗值得教人讚嘆。他用一架大鋼琴，奏有名的樂曲，在未演奏前，他有種種的安排；先把我們聽衆安置在沒有光或光線微弱的地方，意思是要避免光的刺激，然後纔能心專心靜的聽。其次他拿幔子把自己遮起，不讓人看，因爲他需要全身脫光，避去衣服的束縛和他種刺激。再次告訴我們說：「在演奏時不得咳嗽，否則我就要很利害的發怒。」意思是說，他在

演奏時便是整個生命的進行，倘遇到阻礙、刺激，自然非發怒不可。最後待他演奏完畢時，竟渾身流汗，非立刻洗澡不可。當演奏時，聲調是非常強烈、勇猛似是最能代表西洋精神的作品。但也許因我是中國人，——和平而軟綏的心境，對這最能代表西方精神的樂曲，總覺得有些跟不上，不能接頭，不能充分的得到一種滿足。我深知音樂的價值，無奈我對它用不上心去，而在別人處也不曾得到一個滿足。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能從我認識的人中，發見一個偉大的音樂天才。

中西學術之不同

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觀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為宗彷彿有點看重自然，不看重人為這個路數是中國的路數中國兩個重要學派——儒家與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為其根本如四書上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都是充分表見生命自然的意思在儒家中，尤其孟子所傳的一派，更是這個路數彷彿只要他本來的，不想於此外更有什麼例如，發揮本性，盡量充實自己原有的可能性等，都是如此我曾有一個時期致力過佛家的學問，然後轉到儒家於初轉入儒家，給我啓發最大，使我得門而入的，是明儒王心齋先生；他最稱頌自然，我便是由此而對儒家的意思有所理會開始理會甚粗淺，但無粗淺則不能

入門後來再與西洋思想印證，覺得最能發揮盡致，使我深感興趣的是生命派哲學，其主要代表者爲柏格森。記得二十年前余購讀柏氏名著，讀時甚慢，當時嘗有願心，願有從容時間盡讀柏氏書，是人生一大樂事。柏氏說理最痛快、透澈、聰明，美國詹姆士杜威與柏氏，雖非同一學派，但皆曾得力於生命觀念，受生物學影響，而後成其所學。苟細讀杜氏書，自可發見其根本觀念之所在，即可知其說來說去者之爲何。凡眞學問家，必皆有其根本觀念，有其到處運用之方法，或到處運用的眼光；否則便不足以稱爲學問家，特記誦之學耳！眞學問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獨到處，不同學派即不同方法，在學問上結論並不很重要，猶之數學上算式列對，得數並不很重要一樣。

再則，對於我用思想作學問之有幫助者，厥爲讀醫書（我讀醫書與讀佛書同樣無師承）醫書所啟發於我者，仍爲生命，我對醫學所明白的，就是

啓發生命觀念，知道生病時要多靠自己，不要過信醫生，藥物的力量原是有限的。簡言之，恢復身體健康，須完全靠生命自己的力量，別無外物可靠。外力僅可多少有一點幫助，藥物如果有靈，是因其恰好用得合適，把生命力開出來。如用之不當，不惟不能開出生命力，反要妨礙生命的用。藥不是好就是壞，不好不壞者甚少，不好不壞不算藥，僅等於喝水而已。

中國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學和醫學三者，是我思想來源之根柢，在醫學上，我同樣也可說兩句有關於不同學派或不同方法的話；中西醫都是治病，其對象應是一個，所以我最初曾想：「如果都（中醫西醫）只在一個對象上想辦法，雖其見解辦法不同，但在方法上總可發見有其相同相通處。」所以在我未讀醫書前，常想溝通中西醫學，不料及讀後，始知這觀念太不正確，中西醫是無法可以溝通的，雖今人仍多有欲溝通之者，（如丁福保著中西醫

通，（日人對此用工夫者亦甚多）但結果亦祇是在枝節處，偶然發現中醫書上某句話合於科學，或發現某種藥物經化驗認爲可用，又或發見中醫所用單方有效，可以採用等，然都不能算是溝通，因其是澈頭澈尾不同的兩套方法，單站在西醫科學的立場上，説中醫某條是對了，這不能算是已融取了中醫的長處，若僅依西醫的根本態度與方法，而零碎的東拾西檢，那祇能算是整理中醫，給中醫一點説明，並沒有把中醫根本容納進來，把中醫根本容納進來確也不行；那樣，西醫便須放棄其自己的根本方法，則又不成其爲西醫了。所以，最後我是明白了溝通中西醫爲不可能。

如問我：中西醫根本不同之點既在方法，將來是否永爲兩套？我於此雖難作肯定的答復，但比較可相信的是，最後是可以溝通的，不過須在較遠的將來。較遠到何時？要在西醫根本轉變到可以接近或至溝通中醫時，中醫大

概不能轉變，因其沒有辦法，不能說明自己，不能整理自己，故不能進步，恐其只有這個樣子了。只有待西醫根本方法轉變，能與其接近，從西醫來說明他，認識他；否則中醫將是打不倒也立不起來的。

說西醫轉變接近中醫，彷彿是說西醫失敗，實則倒是中醫歸了西醫，因中醫不能解釋自己，認識自己，從人家才得到解釋認識，系統自然還是人家的，須在西醫系統擴大時才能容納中醫，這須有待於較遠的將來。此將來究有多遠？依我看，必須待西醫對生命觀念有所啓發，能以生命作研究對象時；亦即現在西醫研究的對象為身體而非生命，再前進如對生命能更有了解認識時。依我觀察，現在西醫對生命認識不足，實其大短，因其比較看人為各部機關所合成，故其治病幾與修理機器相近，中醫還能算是學問，和其還能站得住者，即在其澈頭澈尾為一生命觀念，與西醫恰好是兩套。試舉一例：我

的第一個男孩，六歲得病，遷延甚久，最後是肚子大，腹膜中有水，送入日本醫院就醫，主治大夫是專門研究兒科的醫學博士，他說必須水消腹小才好，這話當然不錯，他遂用多方讓水消，最後果然水消腹小，他以為是病好了，不料出院不到二十分鐘即死去。這便是他只注意部分的肚子，而不注意整個生命的明證。西醫也切脈，但與中醫切脈不同。中醫切脈，如人將死，一定知道，西醫則否。中醫切脈，是驗生命力量的盛衰，着意整個生命；西醫則只注意部分機關，對整個生命之變化消息，注意不夠。中西醫之不同，可以從許多地方比較，此不過略示一例。再如眼睛有病，在西醫只說是眼睛有病，中醫則說是整個身體失調。通俗的見解是外科找西醫，內科找中醫，此見解雖不高明，但亦有其來源。蓋外科是比較偏於局部的，內科則是關乎整個生命。西醫除對中毒一項，認為是全身之事外，其他任何病症，皆必求其病灶，往往於死後剖視

其病灶所在將病與症候分開，此方法原來是很精確的，但惜其失處即在於局部觀察中醫常是囫圇不分的，沒有西醫精確，如對咳嗽吐血發燒等都看作病，其實這些只是病的徵候，未能將病與症候分開普通中國醫生只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一些從古相傳的方法，這在學理上說，當然不夠，但這些方法固亦有其學理上的根據，凡是學問，皆有其根本方法與眼光，而不在乎得數，中醫是有其根本方法與眼光的，無奈普通醫生只會用古人的得數，所以不能算是學問

大概中國種種學術——尤其醫學與拳術，往深處追求，都可發見其根本方法眼光是歸根於道家凡古代名醫都是神仙家之流，如葛洪、陶宏景、華陀等，他們不單是有一些零碎的技巧法子，實是有其根本所在，彷彿如莊子所說「技而近乎道矣」他們技巧的根本所在，是能與道相通道者何？道即

是宇宙的大生命，通乎道，即與宇宙的大生命相通。在中西醫學上的不同，實可以代表中西一切學術的不同：西醫是走科學的路，中醫是走玄學的路。科學之所以爲科學，即在其是靜的，站在靜的地方去客觀地觀察，他沒有宇宙，只能立於現象之外來靜的觀察現象，故一切皆化爲靜；最後將一切現象，都化爲數學方式表示出來，科學即是一切數學化——一切可以數學表示，便是一切都納入科學之時，這種一切靜化數學化，是人類爲要操縱控制自然所必走的路子；但這僅是一種方法，而非眞實。眞實是動的不可分的（整個一體的）在科學中恰沒有此「動」，沒有此「不可分」；所謂「動」「整個一體不可分」「通宇宙生命爲一體」等，全是不能用眼向外看，用手向外摸，用耳向外聽，乃至用心向外想所能得到的，反是必須收視返聽，向內用力而後可。本來生命是盲目的，普通人的智慧，每爲盲目的生命所用，故智慧亦每變

爲盲目的，表現出有很大的機械性但在中國與印度則恰不然，他是要人智慧不向外用，而返用之於自己生命，使生命成爲智慧的，而非智慧爲役於生命。印度且不說，在中國儒家道家都是如此。儒家之所謂聖人，就是最能了解自己，使生命成爲智慧的普通人之所以異於聖人者，就在於對自己不了解，對自己沒辦法，祇往前盲目的被動的生活，走到那裏是那裏。儒家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表示生命已成功爲智慧的，——彷彿通體透明似的

道家與儒家，本是同樣地要求了解自己，其分別處，在儒家是用全副力量求能了解自己的心理，如所謂反省等（此處不能細說，細說則必與現代心理學作一比較纔可明白，現代心理學最反對內省法，但內省法與反省不同）道家則是要求能了解自己的生理，其主要的工夫是靜坐，靜坐就是收視返聽，不用眼看耳聽外面，而看聽內裏，——看聽乃是譬喻，貞意指了解

認識。開始注意認識的人手處在呼吸、血液循環、消化、等。注意呼吸，使所有呼吸處都能覺察出來。呼吸、血液循環、消化、等，是不隨意筋的活動；關乎這些人平常多不甘用心去管他，道家反是將心跟着呼吸、血液循環、消化、等去走，以求了解他。譬如呼吸——通體（皮膚）都有呼吸，他都要求了解，認識，而後能慢慢地去操縱呼吸，血液循環消化營養等也全是如此，他都有一種細微而清楚地覺察平常人不自覺的活動着的地方，他都有一個覺察，這同樣是將智慧返用諸本身於此纔可以產生高明的醫學。中國醫學之根本在此高明醫學家，大多是相傳的神仙之流的原因亦在此。神仙，我們雖然不曾見過，但據我推想，他可以有其與平常人之不同處，不吃飯也許是可能的。他可以見得遠，聽得細，聞人所未聞，見人所未見。螞蟻走路聲音雖細，但總有聲音，當是可信的，以其——所謂神仙——是靜極了，能聽見螞蟻走路，應亦是可能的。

人的智慧眞不了，用到那裏，則那裏的作用便特別發達，有爲人所想像不到的奇妙。

道家完全是以養生術爲根本，中國拳術亦必與道家相通，否則便不成其爲拳術。這種養生術很接近玄學，或可謂之爲玄學的初步，或差不多就是玄學。所謂『差不多』者，因這種收視返聽，還不能算是內觀；比較着向外，可說是向內觀，但其所觀仍『是外而非內，似內仍爲外』。如所觀察之呼吸、血液循環、消化、等，仍非生命本體。人的生命本與宇宙大生命爲整個一體，契合無間，無彼此相對，無能觀與所觀，如此方是眞的玄學。玄學纔到家。道家還是兩面，雖最後也許沒有兩面，但開頭卻是有的。他所體察者是返觀而非反省，因其有能知與所知兩面，故仍不是一體。以上是推論的話，但也只能作此推論。我們從古人書籍中所能理解的古人造詣，深覺得道家的返觀仍甚粗淺，雖其

最後也許可以由粗淺而即於高深

道家對呼吸、消化、循環、等之能認識了解、操縱運用，其在醫學上的貢獻，眞是了不得西醫無論如何解剖，但其所看到的仍僅是生命活動剩下的痕跡，而非生命活動的本身，無由去推論其變化在解剖上，無論用怎樣精緻的顯微鏡，結果所見仍是粗淺的；無論用如何最高等的工夫，結果所產生的觀念亦終是想像的，而非整個一體的生命道家則是從生命正在活動時，就參加體驗，故其所得者乃爲生命之整體。

總之，東西是兩條不同的路：

一面的根本方法與眼光是靜的、科學的、數學化的、可分的

一面的根本方法與眼光是動的、玄學的、正在運行中不可分的

這兩條路，結果中國的這個方法到會佔優勝無奈現在還是沒辦法，不用說

現在無神仙之流的高明醫生，即有，他站在現代學術的面前，亦將毫無辦法，結果恐亦只能如變戲法似的玩一套把戲，使人驚異而已；因其不能說明自己，即說人家也不能了解，也不信服，所以說中醫是有其學術上的價值與地位，惜其莫能自明，中西醫學現在實無法溝通，能溝通，亦須在較遠的將來始有可能，而此可能之機在西醫，在其能慢慢地研究、進步、轉變，漸與中醫方法接近，將中醫收容進來；中醫只有站在被動地位等人來認識他，所以從這一點說，西洋科學的路子，是學問的正統，從此前進可轉出與科學不同的東西來；但必須從此處轉，才有途徑可循，我常說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沒有經過許多層次階段，而是一步登天；所以現在只有等着人家往前進來接受它，否則只是一個古董，人家拿他無辦法，自己亦無辦法。

中西醫比較着看，西醫之最大所長，而爲中醫之最大所短的，是西醫能

發見病菌，中醫則未能。中醫是從整個生命的變化消長上來論病，是以人爲單位，這樣固對但他不知道這其中的成因，並不是一個單位，而是有兩個能變化消長的力量：一則是身體的强弱虛實，一則是病菌，病菌是活的，同樣能繁殖變化消長此兩者應當分開，不能混作一團看。西醫是能看見兩個重要因子的，但偏重於病菌；中醫則除注意身體的强弱虛實外，對於病菌完全沒有看到。病菌的發現，眞是西醫的最大貢獻

東方學術之根本

我常說，中國印度的學術，是要使生命成爲智慧的，此意甚重要。我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中曾說：

「馬克斯以機械的眼光來解說社會的蛻變改進，我想在歐洲或許是適用的。人類比諸其他動物本來特別見出其能爲事先的考慮思量，而有所揀擇趨避；——這便是所謂意識（因人與其他動物不同，其意識能發達，理智很高）因此人類的歷史似乎就不應當是機械的。「機械的」這句話是指意識之先，意識所不及或意識無容施的（意識似不能與機械並存，這話是反說是實，下面一句纔是正）然我之有生本非意

識的；有生以後，生命本身自然流行，亦幾乎是意識無容施的（注意幾乎二字）意識爲他（生命）用，被他所左右，而不能左右他單就一點一點上看，似乎是意識作主；但橫覽社會，縱觀歷史，而統算起來，意識之用正不出乎無意識，生活上基本的需要，尤其當先（基本需要的範圍，是隨着文化之進而俱進的）則看成是機械的，而從經濟上握其樞機，推論其必然之勢，亦何不可唯物史觀所以說來近理的大概是這原故罷（這話是主而仍爲賓，下面纔是主）然而這意識祇爲意識被役於盲目的生命，故只在這圈裏轉，而不得出耳使一旦意識之向外用者還而對於生命本身生其作用，則此圈遂破，不得而限之矣！例如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產生，便都是超出這唯物史觀的圈外了——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其共同的特點，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單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

生命上來，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爲役於生命（這是主）」

這點便是中國學術和西洋近代學術的一個分水嶺西洋學術之產生，就是由於智慧向外用分析觀察一切，這就是科學科學方法最要之點，即是將一切物觀化將現象放在外面自己站在一邊，纔能看得清楚它非排在外面的格式上不行；不然，就失去物觀性，而不成其爲科學方法了但在中國與印度則不如此；他正好是掉轉過來，不能物觀，「物觀就不是」了。中國的道家比較儒家是粗淺的；道家所觀者雖爲內觀，但仍爲外而非內，現在一般心理學之所謂內省法，與道家不同，但所省者亦仍爲外而非內，與道家陷於同一的缺欠中這話就是說「中西是各走一道」天下事要緊者在此要走那條道，就澈底的走那條道，不澈底是不行的講科學，不能澈底運用科學方法，則無所謂科學；其他一切做學問做事情都是如此，非澈底不可澈底了，則

底下自然要轉灣。你往東去，不能徘徊，走到頭自然一定轉灣，沒有疑問西醫往前走，自然會發見中醫，現在則不能容納中醫，就是這個意思方法只能有一個，不能攙雜調和，攙雜調和就紛亂而無所主，我開頭想調和中西醫，仔細研究之後纔知其不可能，亦卽以此但從科學方法的應用，可以發見哲學的方法，這亦只能期之於將來下面又說：

『但這意識的回向生命本身就個人說，不到一定年齡卽生理心理發達不到相當程度，是不可能的；同樣的，就一民族社會說，基礎條件不備，卽其文化的發達不到相當程度亦是不行所以東西各民族早期的文化，大抵相去不遠，唯物史觀均易說明到得後來，則除歐洲人尙復繼續盲目地奔向前去外，東方有智慧的民族，則已轉變了方向其最大的見徵，卽在經濟方面，生產方法不更進步，生產關係不更開展，現出一種留滯

盤桓的狀態，千年之後，無以異乎千年之前，唯物史觀家莫能究其故』他之所以盤旋不進，就是因爲他的智慧不向外用，他只講返觀內照這如何能讓生產技術進步？在印度遍山遍野幾乎都是講修養的宗教道士，生產技術自必無法進步下面又說：

『而在唯物史觀家所謂「上層建築」的法律政治及一切精神的生活過程，應視其經濟基礎爲決定者，在東方殊不盡然；有許多處或寧說爲從上層支配了下層，較近事實至於歐洲人之爲盲目的前奔，這亦有一大見徵，即在其到了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以及破壞最大的歐洲大戰所含經濟上的機械必然性總之，若沒有以經濟爲主力而推動演出的歐洲近世史，亦不會有馬克斯紬繹得唯物史觀的理論出來大體上這理論亦唯於歐洲社會史上可以前後都適用倘必

以此為準據，要普遍地適用於一切民族社會，恐其難通，尤其本此眼光以觀測印度文化或中國文化已開發後的社會，是不免笑話的。」

我們對於唯物史觀並非不了解，並且亦只有我們才能替唯物史觀找到根本所在：此根本所在即在意識那句話上，乍看意識不是機械，其實它還是機械的，為役於生命下面又說：

「更進一層說，彷彿物體自高處下落一樣，離地面愈近，速度愈加；歐洲社會到近世晚世以來，其機械性亦愈演愈深，這時節，意識不但無救於其陷入機械之勢，而且正為意識作用的發達，愈陷入無法自拔的機械網阱中，使得近世社會日益演成為機械的關係者，舉其大要有三：一是經濟；二是工業；三是科學。三者各為一有力之因，而尤在社會關係的一切經濟化，經濟的工業化，工業的科學化，互為連鎖因緣以成此局，而歸本

則在科學科學者，人類意識發達所開之花今日一切成了科學化，即無不經意識化。於是就化出了這天羅地網！人類之有意識，自生物學上看是一種解放，却不料乃從意識而作繭自縛也。此皆由意識居於被役用地位之故。然於今更不得自休，只有這樣走下去，倒要他徹底才行，徹底自然得到解決——歐洲問題的解決或者更無他途呢？」

東方學術的根本，就在拿人的聰明回頭來用在生命的本身上。此工夫則以儒家為最徹底，他就是專門去開發你當下的自覺，并無另外的反觀內觀，他讓當下自覺更開大。當下自覺，就是當下的是非好惡痛癢，讓這些在當下更切實明白開朗有力，喜歡這個就喜歡這個，不喜歡這個就不喜歡這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毫無半點虛假。道家有所觀的東西，儒家則只是教你當下不馬虎，此即王陽明先生之所謂致良知，亦即真誠之誠，此非反觀，而實是

反觀之最澈底最深者，他是心理的，儒家即如此而已此話許多人都不敢講，其實就是這樣簡單道家之反觀爲生理的，是粗淺的儒家與道家在現在學術界都莫能自明，不能與現代學術接頭，我覺得我有一個最大的責任即爲替中國儒家作一個說明，開出一個與現代學術接頭的機會「人心與人生」一書之作，即願爲儒家與現代學術界之間謀一說明，作一討論此工作甚難作，蓋以明白心理學的人不能明白儒家，明白儒家者又不明白心理學，兩者能都明白而又能有所討論的，這個人現在很難有；我則甚願努力於斯。